



#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警察国家是怎样炼成的

图灵之谜

最早的“微博”和怀特的预言

世界开始向左偏转

—— 欧洲手记

香港

—— 五十年不变与十五年之变

寻找孔飞力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2012年6月 第6卷第5期

总第56期

## 致力于 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 执行编辑

苏小和 王晓渔 成庆 言一  
汪伟 扬克 孙骁骥 灵子

### 轮值编辑

孙骁骥

### 观察员

文学: 朱白(广州) 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 苏小和(北京)  
思想: 成庆(上海)  
文史: 王晓渔(上海)

###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 羽良(北京)  
刘柠(北京) 严飞(美国·旧金山)  
夏佑至(上海)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凌越(广州) 孙骁骥(北京)  
贾葭(香港)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孙传钊(上海) 扬克(德国·图宾根)  
灵子(北京) 燕舞(北京)  
吴强(北京) 言一(成都)

### 翻译

吴万伟(武汉) 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 设计

刘承周

### 细则

- 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 更多即时信息:

<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以下地址下载:

<http://iask.sina.com.cn/u/1682295802/ish?uid=1682295802>

“独立阅读”的微博地址为:

<http://weibo.com/1819737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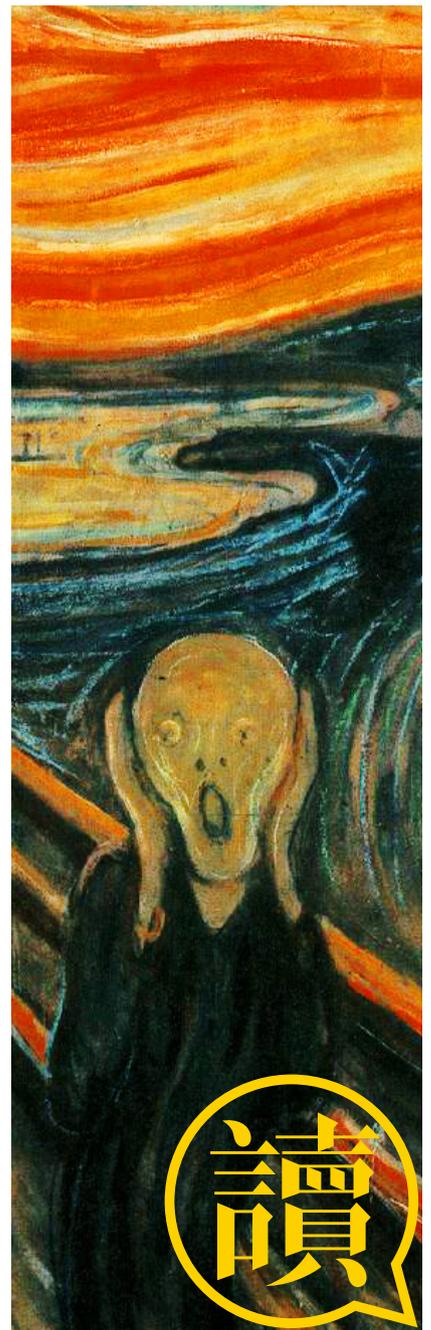
欢迎各位关注。



在本期杂志进入编辑流程之时，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寻找“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的新闻正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讨论。当代物理学界每一次对宇宙基本构成的探索多少都会引起公众层面的哗动，这次也不例外。基本粒子的发现或许有助于我们搭建一个具体的“宇宙模型”。不过，换个角度考虑，任何一个基本粒子单位都可以继续无限细分下去。这正如BBC拍摄的一部科学纪录片所告诉人们的，当主持人询问他手里的绳子有多长时，科学家们的回答是：无限。

“手掌中握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或许我们不必过于介意科学和艺术的分野，二者原本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表达方式。任何大的物质都理论上可以进一步被不断细分。细碎的事件雪片般在我们周围堆积，由此形成了历史和博尔赫斯概念中那个无限的图书馆。某种程度上，无尽的阅读与生活将让我们看上去就像那些寻找“上帝粒子”的科学家，将已经不能再细分的事物继续细分，但最后我们会得到什么呢？这是让每一个阅读者乐此不疲的疑问，或者叫

# 宿命。



# 目录

封面用图

Anxiety 1894  
Edvard Munch



阅读报告  
中国大陆

经济 • 苏小和  
思想 • 成庆  
文史 • 王晓渔

005-020

阅读报告  
台港海外

美国 •  
警察国家是怎样炼成的

021-023

书评

- 马慧元  
图灵之谜
- 罗四鸰  
最早的“微博”和怀特的预言
- 吴强  
世界开始向左偏转  
—— 欧洲手记
- 米格  
香港  
—— 五十年不变与十五年之变

050-063

访谈

- 罗四鸰  
寻找孔飞力
- 田波澜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064-075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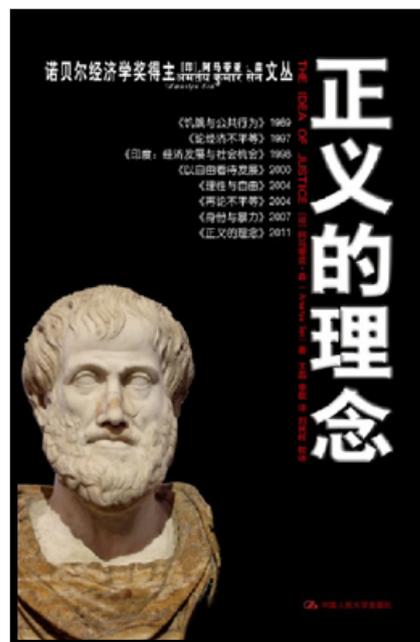
这一段时间读书，新旧交替。先说新书，《正义的理念》，说说诗意的阿玛蒂亚·森。

都说阿玛蒂亚·森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只要仔细读过了他的《正义的理念》，就知道这样的评价，所言不虚。以我个人的趣味来看，我首先发现了，森事实上还是一个诗人，或者说是一个品味极高的诗歌鉴赏家。

想必有很多人知道，森的名字来自泰戈尔的大好创意。1933年，森出生，他的外公是泰戈尔的秘书，找到泰戈尔给自己的外孙赋予一个诗歌一样的名字，泰戈尔就想到了阿玛蒂亚这样具有诗意的名词。泰戈尔说，阿玛蒂亚，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极有想象力的词语，是一个充满了正义、公平和爱的国度。

如此优美的细节，似乎定义了森一辈子的人生追求。他很喜欢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尤其是第35首：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垣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展；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到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我读《正义的理念》，联想到泰戈尔的这首诗歌，几乎成了习惯。的确，森对正义的界定，不是一种先验主义性质的终极美好，而是在于一种比较选择的过程，在于一种不懈的努力，在于始终对准了完美的方向。在这样的意义上，森首先不同意罗尔斯、诺齐克等学者在主权国家范围之内寻求正义理论的方法路径，主张沿着孔多

塞、亚当斯密的道路，将正义定义为一种普世价值，一种“全球性正义”，一种越过主权国家边界的人类文明共识。其次，森主张关注人类实际的生活与现实，关注一种与正义有关的行动和责任，而不是只停留在制度规则上，关注如何减少不公正，而不是乌托邦式的去追求绝对公正，主张多种不同的正义缘由，而不是将一种正义的缘由定于一尊。正是立足于这种丰富的正义之声，阿玛蒂亚森用他百科全书式的论证与思辨，向世界见证了正义的美好及其可能性。

由此，森诗意的呈现，开始向深度拓展。比如他提到了T·S·艾略特，他的著名的《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 人大出版社的中文版好像翻译错了，翻译成了“四季”):

不必夸大行动的后果

向前走吧。

不是永别，而是扬帆前行

航海的人们。

森特别提到这些艾略特的诗句，是想在学理的层面陈述一种现实的比较性的视角，或者方法。这应该是森反复陈述的立场：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追求正义的主旨，并不仅仅是努力建立或者梦想建立一个绝对公正的社会，或者确立绝对公正的社会制度，而是避

免出现极度恶劣的不公正。

为了强调这样的立场，森举例说明，18至19世纪，人们即便在为废除奴隶制而激辩不已，也并没有幻想这个世界会因为奴隶制度的废除而变得绝对公正。人们只是认为，存在奴隶制的社会，是极其不公正的。

应该说，森具有一种理性的次优选择式的智慧，这个世界的美好，只能是一种次优的美好，一种最不坏的美好。这个世界不存在一种能够使得所有人都认为中立而且表示赞同的绝对公正的社会安排，重要的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而是人们实际拥有的可行能力，重要的不是绝对的效用和幸福，而是人们对现实的改进能力。在这样的意义上，自由选择显得如此重要，选择之后的责任与义务显得如此重要，因为这样的行为，是我们的自主选择，它不是遥远的凌空虚蹈，不是对当下苦难的回避与曲解。

森想到了谢默思·希尼的诗歌：

历史告诉我们

不要站在人间抱有希望

但是生命之中会有一次

不断涌起的、渴望太久的、正义的浪头

在这里，希望和历史的产生了碰撞。

“天国不在地上”，森的意思是说，行动意味着一切，去努力，去改变，而不是停留在乌有之乡。用经验主义，而不是超验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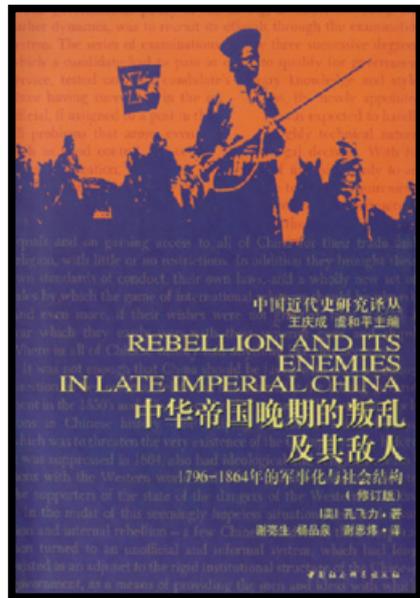
义，去感受生活，去发现世界的真相。生命是一场渐进的过程，不是一个停滞的、终极的美好秩序，人，永远在路上，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渐渐展开的社会，也是如此。

正是在这样诗意的立场上，森开始构建他关于正义理念的学术脉络，在经验主义和超验主义的差异地带，构建属于他的正义学术秩序。

是的，关于正义的理念，人们首先必须关注托马斯·霍布斯，以及他的门生，让·雅克·卢梭、约翰·洛克，以及著名的伊曼努尔·康德。这是致力于建立公正社会制度的“先验的制度主义”，而不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正义或者非正义。他们竭尽全力探索终极的社会正义，不对现实并不完美的社会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他们苦思冥想正义的本质，而不是直接指出，哪一种社会相对而言更为公正。

在森看来，这样的学术建构，的确有很大的问题。由任何预设的制度所孕育出来的社会，一定要受到很多非制度因素的影响。现实世界既是真实的，更具有不确定性。沿着这样的路径，这些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们，一方面假想社会按照某种虚拟的契约在运作，契约论由此成为一种终极的美好秩序，这种理想的模式终于在学理的层面取代了正在发生的社会性无秩序。

立足于这样的学术线索，阿玛蒂亚·森把他的研究目光锁定在另外一批启蒙主义思想家的身上，尤其是那些采用了



比较分析方法来关注社会现实的思想家，比如亚当·斯密、孔多塞、边沁、沃斯通克拉夫特、约翰·穆勒。这些处在另外一条路径上的思想家们，普遍致力于现实社会的分析与改进，而不是先验主义地去寻找绝对意义上的公正社会。他们的方法论如此直接，那就是抵制或者消灭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上明显的不公正制度。

这才是森的正义理论的出发点。所谓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森的正义理论牢牢建立在真实的世界之上。这正是他诗意盎然的地带，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在一个现实的世界挥之不去的思考与行动。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森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诗人，他的梦想无所不在，他的行动矢志不渝。

接下来说一说孔飞力以及与他有关的一些课题，一些书。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是研究晚清向民国转型的高手，他的著作《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及其流动的问题》，主要就是研究中国在进入20世纪之后民间社会和市场经济交替上升，如何改变了国家的方向。相同性质的著述，孔飞力还有一本《》，周锡瑞先生的《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三章集中分析了“城市精英阶层的改革者”，他们的观点深深影响了法国的历史学家白吉尔，他的一本更加著名的著作，就是后来收录进剑桥中国史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关于黄金时代，可谓众所周知，那是一个中国企业家集体缅怀的时代。

一次系统的阅读生活，将我们带到问题的深处。为什么晚清谢幕之后不到30年的时间之内，中国这个传统封闭的农耕经济国家会出现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高峰，其历史逻辑究竟在哪里？现在看来，答案其实是明显的：晚清最后20多年的时间之内，通商口岸出现了成熟的商业精英阶层，他们一方面承担着市场自由交换的职能，一方面承担着相当一部分社会公益的职能，由此带动了内地相当一批城市的社会自治格局。

的确，历史出现了转型的契机：政府的力量长期以来苦于财力不够，或者执行力有限，一直处在松散且不作为的状态。现

在，民间的、市场的商业力量崛起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肩负起社会管理的职能。这类类似于日后人们总结出来的非政府组织，或者是民间自治的局面。诸如发展慈善事业、维护社会治安、疏通河道、修筑堤坝、城市的下水道治理、港口维修，以及实业型企业的创建与管理。到晚清末年，这样的社会自治局面，差不多成为一种常态，不仅商人群体自己亲力亲为，而且将过去传统的士绅阶层也接纳进来，从而进一步加大了民间社会自治的范围和力度。

和其他国家市场化、现代化的进程类似，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也是从城市的商业精英阶层开始的。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社会现象，城市精英阶层在社会管理的层面，构成了一种能够和中央集权博弈的社会性力量，这种力量的崛起，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潜滋暗长。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各种学术团体和教育会开始产生，1897年，上海创立了第一家农会，1905年江苏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间教育会。农会的主要关注由日本引进过来的农业技术，他们办有自己的刊物，试图向上海周边的农村推广。教育会的使命感显得更大，他们不仅关注教育与学术，还要求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参与到了管理的培训计划之中。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民间自治组织的出现，事实上也是通商口岸的外国商业机构为中国人提供了样本。现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表述，对民主选举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的认识，主要是上海商业组织借鉴了外国商业机构的方法，1903年，这样的原则正式写进了上海总商会的章程。1905年，上海的另一家商业机构，城厢内外总工程师，也采用了这样的民主原则。今天依然在运行的城市市政管理办法，主要也是当时的上海民间机构从英美公共租界和法国的租借的经验中借鉴而来。

必须指出一个事实，种种民间自治力量的勃兴，并不构成和晚清政府的直接对抗，相反，这些自治性组织完全不希望看到晚清朝廷的中央集权体制的消失，或是过分的削弱，他们谋求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改良性力量。这是城市商业经营阶层参与社会管理事务的过程中必然占据的立场和方法。事实的确是这样的，晚清末年，当朝廷兴起一批技术性官僚，几乎所有参与到洋务运动中的专业人员和企业家，都按照这个逻辑组合起来，到1900年代，新兴的商业精英阶层以及他们培养起来的民间自治力量，与朝廷的官僚体系，达成了一种暂时的共识，导致地方行政管理权力向城市机构转移，一批有专业背景，有商业能力，同时又有社会管理经验的精英人群，为官僚体制输送了大批的社会管理人才。而这样的格局，对于朝廷而言，也是能够接受的，一方面，朝廷当然不愿意放弃通过官僚机构来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权力，另外一方面，社会自治的力量参与到改良的过程中，也为朝廷谋求进一步的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总之，晚清末年，传统的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和民间社会的自治经验相结合，整个城市的管理秩序，其总体利益似乎是一致的。

社会自治的管理秩序，具有醒目的示范效应，而且天然具有协调性。不同的社会自治团体很快找到了合作的理由和途径，社会精英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展。散落在各个城市的社会精英，既拥有富裕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参与社会管理的兴趣和能力，他们在一个时代的凸起，几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比如在江苏，这个受到通商口岸海外商业经验深深影响的地区，就涌现了一批真正的精英人物。

张謇（1853-1926）是那个时代最具有社会管理能力的企业家精英，他几乎成了南通的行政长官，如果站在地方自治的角度看张謇，他应该算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最成功的企业自治领袖。

黄炎培（1878-1965）在自己的家乡川沙兴办学校，他是近代以来在教育自治方面走得比较远的社会精英之一，一方面做一些基础性的教育工作，一方面不断发出改良社会的声音，差点被慈禧砍头，幸得一名基督教牧师的保护，才得以脱身。

马相伯（1840-1939）的贡献更大，震旦大学的创始人，基督徒，神学博士，培养出了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大学者。早年曾经致力于洋务，中年后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教育事业上。著名的“毁家兴学”，即马相伯所为。1900年，他将自己的全部家

产，清浦、松江的3000亩田产全部捐赠给教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赠家产兴学”的字据，规定这些钱财是日后培养学生的助学金。马相伯在教育层面的自治性努力，以及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不过他在晚年曾经对前来看望他的胡愈之先生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叫醒中国人”。

罗振玉(1866-1940)，江苏淮安人，著名的金石学家，在甲骨文研究和敦煌研究方面成就卓著，曾经以一己之力保护晚清大库档案，让明清两代历史第一手资料得以部分幸存。同样，他也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曾经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培养了包括王国维在内的诸多大学者，他还担任过京师大学堂农学堂的校长，日后的中国农业大学即来源于此。

许鼎霖(1857-1915)，著名的实业家，参与创办耀徐玻璃公司、赣丰机器油饼厂、海赣垦牧公司、大达外江轮船公司等。和张謇、沈云霈并称“苏北三大名流”。是晚清末年真正的社会精英，今天江苏的企业家传统，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许鼎霖。

这些在企业，教育，学术领域具有杰出才能的社会精英，构成了一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最有思想意义的风景。他们不仅在自己的领域承担着领导作用，而且促成了各个领域各个团体之间的直接合作，从而是政府行政机构的决策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力。这可以说是晚清末年最有价值的社会

现象，一个由专家、社会精英构成的社会管理阶层由此产生，他们是这个时代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改革者，他们普遍具有保守主义的改良特征，相比那些革命者，那些愤怒的暴力推崇者，这一批社会精英的政治属性，最为清晰，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对市场的自发秩序，民间社会的自治经验的认识，可谓前无古人。

整个国家都在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自治的方向，甚至是宪政的方向发展，这正是民间自治秩序和朝廷大一统的管理秩序博弈的结果。晚清的社会图景是这样的，社会精英在探索社会管理的新方法，朝廷也在探索。区别在于，朝廷设立的一系列控制性机构，很快就变得软弱无力，甚至固步自封。重要的是，传统的思维方式让他们始终认为，民间的自治力量一直处在朝廷的管辖范围之内，双方的博弈并不在一个平等对话的层面。但是，新兴的社会精英阶层显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拒绝政府制定的辅助性角色，而是谋求平等对话者的身份，不断对国家制度，对社会管理提出自己的批评和建议。

双方之间的张力是巨大的。晚清政府对这些自发的民间机构非常不安，事实上民间团体的联盟变得越来越紧密。1907年，商会的联合可谓狂飙突进，他们在上海聚会，成立了有别于朝廷商部的民间商会联合会，与之相适应，到1907年年底，各省商会代表在上海再聚会，选举产生了全国性

的商会代表。1911年5月，教育会的代表在上海举行大集会，并且制定了共同纲领，建立了一个常设机构，中国教育会。1909年11月，17个省的咨议局的57位代表聚会上海，张謇倡议，发起了一次要求全国召开真正国会的请愿运动，全国上下响应者众多。

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晚清政府试图努力控制民间社会的努力归于失败。而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则是，不断兴起的民间自治力量并没有谋求革命性的暴力，而是致力于一种对话性的博弈，一种和平的改良。从历史上看，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完全区别于那些暴力性的农民起义，区别于不久之前的具有彻底破坏性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晚清中国的变革，或多或少具有英

国光荣革命的影子，至少一个历史事实摆在这里，晚清的谢幕，并没有发生巨大的战争，没有血流成河，没有民不聊生，中国的历史第一次以一种看上去渐进、和平的方式，走进了新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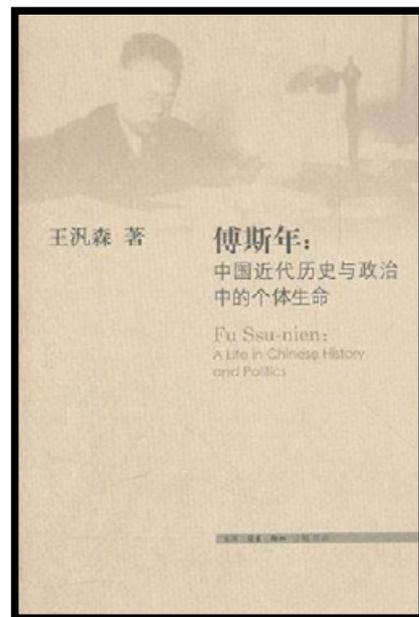
这样的变化，既不是晚清自由贸易的结果，也不是近代洋务运动的结果，更加本质的内在动因，是市场的自发秩序、社会的自治秩序构建了一个多样性的社会，士绅阶层的分裂，现代城市精英阶层的崛起，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一个时代的思想在裂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多样选择的可能，古老的集权式管理基础被瓦解，延续千年的单向度社会终于衍生出一种市民社会，而这正是一个伟大的市场经济时代，一个企业家的黄金时代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Q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人人皆知“五四”这一代知识分子开风气之先，且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世精神，但细细想来，这一代知识人“行重于思”，往往保种保国心切，大多在思想学术上未能有太多精彩的发挥。出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何炳棣先生，在西南联大期间就自视极高，大有舍我其谁的气势，追问这番自信来源何处，除开个人的个性气质之外，他的五四前辈们大多忙于救国、疏于治学，或许也是原因之一。

这种“弑父”心理并不奇怪，早年服膺于救国救民的殷海光，去台之后也一大变，开始批评“五四”前辈们的思想学术肤浅不力。当时林毓生先生初出国门，与殷海光先生隔海问学，信中对“五四一代”的代表人物——胡适先生颇多臧否之词：“自五四以来像他这种只会“眼到、手到、脚到”，内心深处平淡的像一杯白开水的人，怎么会领袖群伦数十年？傅孟真以霸才闻，又怎么会居然被他罩住一辈子？”

“以霸才闻”，自然是对傅斯年先生的极高评价，不过傅斯年果真与胡适是两路人？他们的学术思想的底色究竟有哪些异同？关于傅斯年先生的思想，学界虽多有评价，但大多没有将他放在整个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里去审视。好在王汎森先生的博士论文《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



治中的个体生命》（王晓冰译，三联书店，2012年5月）终于译成中文出版，基本能将这段学术思想史的脉络梳理清楚。胡傅二人结识于北大课堂，后者折服于前者宏大的“中国哲学史观”，前者也靠傅斯年这样的学生领袖保驾护航，树立权威。不过二人在思想上有一个重要共识，那就是中国思想偏重于道德哲学是近代落后的重要根源，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前有胡适的“整理国故”，后有傅斯年的实证主义史学，都直指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胡适与傅斯年，都完整且持续的继承了“五四反传统”的遗产，并最终将其糅合成引领学术界数十年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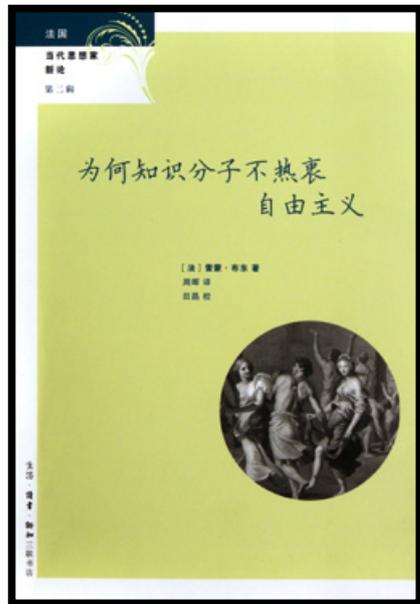
不过，王汎森先生最将傅斯年的一生定性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何以失败？大陆易帜当然算，而其晚年重新归心孟子，更是对其早年反传统文化的一次自我反省，或可也算。不过傅斯年毕竟没有真正告别五四，他晚年对自由主义的坚持，仍然延续着其师胡适的政治立场，只是他逐渐意识到，作为自由主义者，在中国显然要经受各种思潮的挑战，这些挑战的内容与力量，显然比“五四青年”们当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

在今天，自由主义显然面临的“敌人”或“不满者”要比傅斯年去世时要“色彩斑斓”的多，尤其在知识圈内，自由主义更如众矢之的。雷蒙·布东在《为何知识分子不热衷自由主义》（周暉译，田晶校，三联书店，2012年3月）中分析了为何西方知识界对于“自由主义”往往显得冷漠，甚至是敌视。他首先承认，“自由主义不具备其他‘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力量，无法对世界提供一个（完全）整体的视角：它无法成为一个意识形态，也无法成为一个‘入世宗教’。

“但是他却认为，自由主义这种“非整体化”的特征也正是其长处，这使得它的意识形态不那么专断和暴戾。而面对自由主义会导致“庸俗化”和“堕落化”的批评，布东更是指出，在非自由国家里，这种道德与文化的“堕落”并不鲜见，而且在当代的自由主义国家中间，许多“非庸俗化”的文化产品仍然在大量的出现。细细想来，类似的指

责与批判在当下的中国思想界，不正在轰轰烈烈地上演吗？

最近出版的好书颇有一个小高潮的架势，如粟本慎一郎的《布达佩斯的故事》（孙传钊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6月），近代匈牙利的思想家，有名者莫过于波拉尼兄弟，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在《旁观者》一书中描写过波拉尼家族的情形。在20世纪的布达佩斯，不仅出现过波拉尼兄弟，还有哲学家卢卡奇，音乐家巴托克、科学家冯诺依曼，如此种种，简直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媲美。在此期间，布达佩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56年面对苏联的起义等诸多历史重要时刻，到底这座城市拥有何等的精神性格？大家不妨取来一读。值得



补充一句的是，同是描写城市的精神史，Alan Janik与Stephen Toulmin合著的Wittengestein's Vienna(《维特根斯坦的维也纳》)更是一本相当精彩的著作，此书以白描式的手笔描绘了当时维也纳的群贤们，如米塞斯、哈耶克、门格尔、以及当下逐渐被国人熟悉的沃格林等等。在当时的维也纳，石里克的“维也纳小组”只能算非常边缘的思想群体，由此可见这座城市的思想高度之一斑了。不过此书一直未有译介为中文，实为遗憾。Q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

对于近代史，我最感兴趣的是1898年至1928年。1898年，戊戌变法；1928年，国民党开始“训政”。不过三十年的时间，从帝国到民国到党国，城头变幻大王旗，令人目不暇接。

一直关注1928年前后的知识阶层，最近集中阅读了几本与20年代有关的书籍，如李在全的《法治与党治：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党化（1923-194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3月）、王建伟的《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美国学者薛龙的《张作霖和王永江：北洋军阀时代的奉天政府》（徐有威、杨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4月）。还有一本关于民初，是张耀杰的《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团结出版社，2012年5月）。

教科书常把民国的终结定为1949年。但在我看来，1928年“民国”就已经终结了。这并非我的一家之言，章太炎在1928年之后自称“民国遗民”。南京国民政府“以党治国”，这是民国终结的重要标志。从割据广东到统一全国，国民党政权一以贯之地推动以党治代替法治。《法治与党治》完整地呈现了司法党化的历史过程，同时指出民意常是“司法党化”的重要中



介，这一点尤为值得重视。法治未必等于民意，否则“多数人的暴政”就成了法治。国民党政权着力放大民众对法治的不满，以“党代表民”为由，以党治代替法治，最终“多数人的暴政”为“少数人的专制”铺平了道路。

20年代不仅出现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大革命”，也产生了一套影响深远的革命话语，“口号”是革命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集中研究了“反帝”、“打倒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反赤化”等口号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从选题到行文，均能看出“新文化史”的影

响，但是作者并未生吞活剥这一理论，而是融于叙述和分析之中。口号具有一种“魔力”，不仅是语言，也是行动，能够起到动员的作用。回顾口号的诞生和生长史，是一种最好的“祛魅”方式。

对于北洋政府，一直缺乏相对中性的研究。此前的历史习惯于妖魔化，《文武北洋》（李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又有完美化之嫌。最近《文武北洋》修订再版，尚未来得及对比，不知是否有所调整。

《张作霖和王永江》提醒后来的读者，当时中国各省政府通常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军政、一个是民政。作者并不否认“军阀”的负面作用，但是同时指出，民政官员的努力使得“军阀”的负面作用得到缓冲，

“民政官员一直遏制和限制军阀统治的影响”。1916年至1926年，王永江在奉天政府担任了十年的民政职务，当过多年的财政厅

厅长。他与张作霖既有合作，又有冲突，对奉天的民政建设起到重要作用。

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呈现了奉天政府的历史，更在于发现一个常被忽略的层面，即“军阀”时代的文人政府。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对同一个时代会有着截然不同的评判，因为那个时代自身就存在着极为多样的景象。无论褒贬，均需尊重历史。如果文人政府的努力，被忽视或者被归功于常与他们发生摩擦的“军阀”，未免有些张冠李戴、南辕北辙。

宋教仁被刺发生在民国初年，可是这一事件直接决定了民国的走向。《谁谋杀了宋教仁》通过考证得出一个观点，宋教仁之死，并非死于袁世凯，而是死于国民党内部的党争。宋教仁的和平议会路线与国民党内的武力革命路线产生冲突，导致了他死于同党之手，这一事件同时也开启了民国终结的按钮。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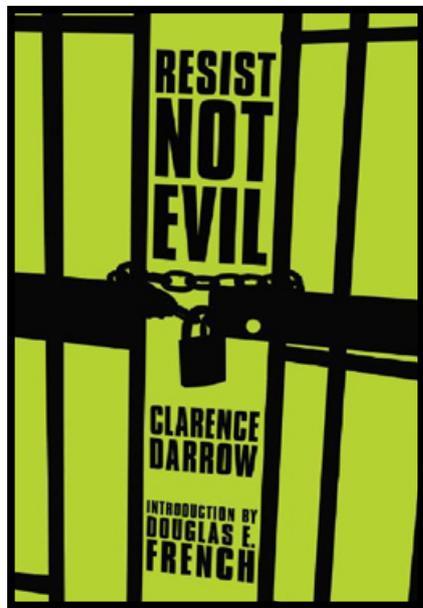
## 警察国家是怎样炼成的

特约撰稿人 孙晓骥（北京, sunjiaoji@gmail.com）

和大家分享一本我最近读过的书，名叫《勿抗恶》（Resist Not Evil），作者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达罗1857年生于俄亥俄州的乡村，1938年卒于芝加哥，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倾注于法庭辩护当中。他最为公众熟知的事情是在一系列刑事案件的庭审中为嫌疑犯辩护。同时，达罗还是一位自然法理论家和死刑废除倡导者。透过《勿抗恶》一书，我们可以一窥其政治、法律思想的轮廓和很多独到见解。

达罗崇尚自然法理论。自古希腊以降，自然法的发展历史相当漫长，但大致来说，近代的自然法论者都崇尚人类生而拥有的平等权利，并且承认由人的本质所自然产生的道德秩序。但区别在于，当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在生而具有的道德秩序以外，人类社会依然需要成文法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另一部分人认为，其实人类根本不需要法律体系和统治机构，也能有秩序地生活。达罗无疑属于后者。

达罗认为，普通人视之为“公正”化身的国家法律，其实未必能体现道德上的公正。严刑峻法本身的存在，便是公正的最大敌人。他以“法律可以震慑犯罪”这个所谓的常识为例，进行了一番辩驳。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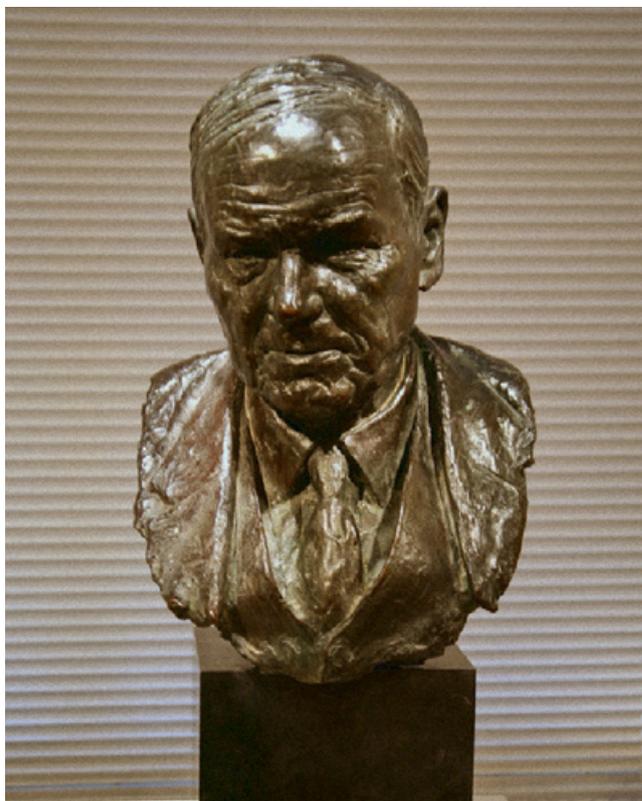
Clarence Darrow,  
Resist not evil,  
Haldeman-Julius, 1925

的“震慑”，意指通过一定的手段让所有人了解到，如果触犯某个法条将会受到何等惩治。就震慑犯罪的威力而言，没有什么比得上古代在公共场所处以的极刑。断头台、绞索、火刑架，这些如今只在历史书中出现的东​​西能够将刑罚的可怖最直接地传递给观看者，可以说最具“震慑力”。按理说，生活在血淋淋的断头台时代的人们，其犯罪的可能性应该最小。但实际上，西欧国家在公开处刑最为流行的中世纪，犯罪率并不低。相反，在法律“震慑力”大为

减低的现代社会看来，古代欧洲就是一个盗贼遍地的社会。

法律的“震慑”作用似乎不太靠得住。不仅如此，达罗还认为，公开行刑会激起观看者的集体亢奋情绪和人性中恶的一面。过去，公开的处刑通常伴随着人们的欢庆盛会，甚至会引发骚乱与暴动。这是统治者——同时也是法律的制定者所惧怕看到的。因此，更聪明的统治者选择用隐秘的手段进行处刑，而不再残忍地公开行刑。我们习惯性地将断头台、绞索的废除视作人道主义的胜利。在达罗看来，这无非是统治者为了避免激发集体情绪而采取的措施罢了。而当公开的行刑工具被推倒，秘密的处刑便以更快的速度开始增长，由此出现了能够神不知鬼不觉把人抓捕、让人“神秘消失”的维安人员、秘密警察和暴力机构。我们也就此踏上了警察国家的道路。

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所说，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酷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惩罚机制“脱离了人们日常感受的领域，进入抽象意识的领域”。换言之，刑罚在肉体上的震慑力转而被观念上、精神上的惩罚机制所取代。在这样的惩罚机制下，通过教育的灌输，每个人在思想上都确信，国家的法律代表着所谓的“公正”，一旦触犯，其结果直接会在道德上将这个人于周围彻底孤立开来。他会被剥夺政治、经济上的权力。更关键的是，就



整个社会而言，犯罪者将从此彻底受到周围人们偏见眼光的对待。这不啻为一种终身的服刑。想想我们自己如何看待那些有过前科的普通人以及服刑人员吧。

因此，警察国家的统治能够持续，并不是靠现实的监狱，而是依靠人们观念上自我构建的一座监狱。这种观念迫使人们以恐惧的心态看待法律，人们不违法不是因为认为犯罪是一种恶行，而仅仅因为害怕惩罚。但讽刺的是，这个利用人的恐惧心而建立统治的警察国家，却经常打着“正义”、“公平”的幌子进行着非正义的勾当。这样的统治特点，在达罗看来，并没有随着所谓的民主制度的建立而消失。因

为我们依然拥有由少数人制定的维护既得利益的法律。但是，除了散布恐惧、仇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之外，这样的法律与正义恐怕已经没有什么联系了。

罗斯巴德在《自由的伦理》里曾经批评一些自然法理论者动不动就把道德行为提升到国家层面，并且说他们“事实上混淆了‘社会’和‘国家’。”把道德与国家捆绑在一起的见解其实是相当流行的，不少人都认为，国家制定的法律是秩序的保证，如果没有政府颁布的法律、没有法庭和律师、乃至没有政府，那么我们会陷入霍布斯所描述的“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敌人”的混乱状态。这种思维定式让我们不知不觉成为了一群自发的“国家主义者”。过着卖白菜的生活，却操着统治者的心。当一国的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思维习惯的时候，获益最大的其实就是统治者，因为他的种种行为都得到了“国家主义者”的理解和体谅，并且这种理解和体谅都是在法律的名义之下产生的，其合理性自然确凿无疑。然而，拥有这样子思维的人，从来不会考虑：法律、政府、暴力机关的横行对于独立的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达罗的结论开始令我吃了一惊。他认为，在这样的体制下生活，人会渐渐失去爱的能力。再一琢磨，我对他提出的看法又不感到奇怪了。这本书的名字“Resist

Not Evil”本来就是取自《圣经》里的一段话，它的意思并不是要人们在“恶”的面前束手待毙，而是要正视“恶”的存在，并以“爱”来感化“恶”。达罗视犯罪为一种“疾病”，其来源是人性中的“恶”。身体上有病变谓之疾病，那么，犯罪也可以解读为灵魂上的病变。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对待罪犯也应该像对待普通病人那样，怀着“爱”和“救助”的态度来帮助他，而不是诅咒、否定他，甚至强行让他从这个世界消失。既然没有因为生病而被处决的人，也不应该有因为犯罪而被处决的人。

依照达罗的逻辑，我们不难进一步推想说：在一个依靠仇恨和恐惧统治的所谓“法制”国家，人们笃信的不可能是“爱”，而只可能是赤裸裸的暴力以及暴力背后那堂而皇之的法律。在这里，所谓的正义仅仅意味着免于被处罚，而罪犯不过是一群等待处决的“不可接触者”而已。我们躲避着罪行，躲避着法条，却又不得不时时刻刻面对自己内心的“恶”，猜测着他人的“恶”。最可悲之处在于，竟无人可以搭救。

读完这本书，我在想，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是一个警察国家吗？我一时想不出答案，不过，掂量一下“爱”这个字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所占有的分量，或许能在某种意义上解答这个疑问吧。📍

# 图灵之谜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 [huiyuanma@gmail.com](mailto:huiyuanma@gmail.com)）

## 一 关于这本传记

几年前我颇有些在网上闲聊的热情，有一次不小心在某个帖子里脱口而出：“如果我只打算把一本书翻成中文，那么一定是Andrew 霍奇斯的这本《艾伦·图灵传——谜一样的解谜者》。”说归说，我并没有足够的毅力和时间去践约。

这本厚厚的传记，我当时只看过一小部分，印象深刻。简单地说，图灵是这么个英国人：生于1912，死于1954，是数学天才也是同性恋，这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英国还是大忌。1952年，因为报告自己的住处被人抢劫而被警方发觉（引贼入室的正是他的伴侣），被强迫注射雌性荷尔蒙。不满四十二岁的时候，他最终吃掉一个毒苹果而死——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本书提到图灵的死，居然一笔带过，只说结果。虽说图灵那一刻没有目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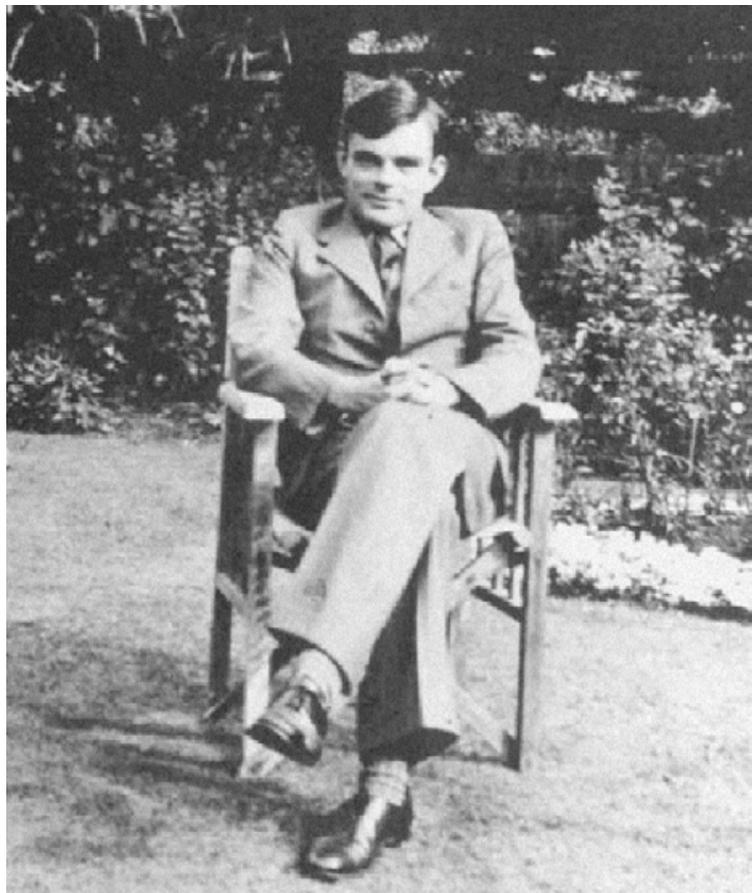
者，但如果他愿意的话，无论如何可以八卦出来，顺便煽情几句。但是，他这样说，“图灵象白雪公主那样，吃了一只毒苹果。”好个浪漫的死法，好个简单的描述，简单得乖僻而残酷。本书作者霍奇斯的冷静令人十分吃惊。我见过冷静的作者，但没见过这么冷静的。他自己也是同性恋，按理说同病相怜，但他一切叙述皆从外部证据入手，一直讲到五十年代对同性恋的残忍“治疗”，仍然不动声色，不妄自推测，不抒情，不悲伤——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倒真像图灵测试中那个既冰冷又诡异的回答者！慢着，难道我们这个世界不就这么荒诞么，从外部永难抵达深渊一样的真相。

如今冷静下来再细读这本书，仍然感想多多。观看科学家的人格和抽象思考互相投射，确实很有意思，尽管不敢妄加解读，尽管怎么解读也是谜上加谜。

话说作者霍奇斯也是一位奇士，我

爱屋及乌，对他也产生一些兴趣。这个人把形而上，形而下，都弄得津津有味，一边宣称自己跟图灵一样是公开的同性恋，一边敬业狂热地工作和写作。他还正巧是名物理学家，《皇帝新脑》的作者、人工智能的反对者彭罗斯的学生，现在在牛津数学系教书。他的网页上琐碎地写他做了什么工作，打什么工，十分自得。提到让他出名的，卖了十万册的图灵传记，他说图灵不会想到自己会那么出名，不会介意自己作为一个纯数学家，只被同行知道。而他为此书在两年时间里全职写作，以微薄的资助维持生计——“由于条件所限，只能被迫尽快完成任务，有时简直草率得像图灵的鞋带！”

图灵的老母亲在他死后写了一本薄薄的传记。霍奇斯说，奇怪的是，她写的传记却带有难得的客观色彩，好象写陌生人——后来我借了这本小册子来读，印证了这个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图灵的母亲不仅不懂数学，也不懂得他（哪怕母亲可以津津乐道图灵小时候的脏脸蛋、涂鸦、打架），她对科学的全部理解就是“应用”。看到这几句，我不由大恸，为这交流的阻隔、简单的悲哀。图灵非常爱母亲，然而他的古怪行径无疑让母亲担忧多年，毫无办法，他后来接受“治疗（注射荷尔蒙）”，流露出自杀之意，不过他曾向母亲一再保证，不会伤害自己。图灵死前没有遗嘱，没有任何确切证明自杀的迹象。他没有留下任何抗议，看上去不能排除意外而死——也许是因为顾及对母亲的承诺吧。母亲真的一直相信，他是不慎服



毒而死的，因为那些日子里，他迷上了化学实验。

霍奇斯写道，图灵母亲的传记，最大的优点是客观，最大的缺点是，只会以别人的结论判断自己的儿子，好象儿子是小学生，时时靠老师打分。她最喜欢说的是，儿子的成绩被哪位名流赞扬了，获得什么奖，和自幼厌恶势利和规矩的图灵完全不同。儿子飞扬而纯真的天性，她也从来不曾懂得一点点。这样说来，儿子真的是陌生人。母爱留不住他，他终将消失。这个不修边幅的大男孩，似乎也从来不理解这个世界，他只会以自己的方式和世界对话。青年时期，他曾和如今公认的计算机科学创始人之一冯·诺依曼一起工作，

也难以沟通，尽管诺依曼非常欣赏他。按理说两人都才华超群，志趣类似，本应惺惺相惜，然而冯·诺依曼是炙手可热的学界巨头，从研究到管理处处处如鱼得水，同时拥有工程经验、良好教养，那时已被公认为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而年轻的图灵则只有坚硬、锐利的思想和不圆通的个性，除此之外，交际笨拙、没有管理能力，在研究上则另辟蹊径，无可依靠。剑桥之后，图灵在普林斯顿大学随数学家丘奇读博士，其间给母亲写信，“他昨天带我去吃晚饭。这些人都是大学教授，可是谈话内容真让我失望。他们只对自己的事情有兴趣，这些旅行琐事真把我烦死了。”毕业后，他谢绝了和冯·诺依曼合作的机会，回到英国。

而“不沟通”这几个字，让我感慨多多。世上的天才奇思，往往在“不沟通”的状态下孕育而成，而人世不只需要奇思妙想。种种芜杂俗务，要的就是个体与环境步调一致，水往低处流。

如此这般，你才能换来他人之眼中的正常生活。

图灵其人的形象，由今人之口来叙述，倒是很容易被脸谱化成“天才怪人”。而当年因畸恋被排斥而形成的封闭和痛苦，今人无法分担。少年时代，他显露出聪明，不过他自己也不知道以后会有怎样的道路。他和别的孩子一样考各种试，去争取奖学金，也有过失败的经历，不过最后如愿以偿，进了剑桥。这期间的科学兴趣，和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伴侣克里斯托夫有关。克里斯托夫十分聪明，热爱科

学，先得了三一学院的奖学金，而图灵没拿到，克里斯托夫要去上学，他俩一起去听音乐会，图灵知道要和他分开，劝说自己“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可是，克里斯托夫当夜就生了急病。六天的挣扎之后，克里斯托夫死了。十八岁的图灵完全被击垮，这是他最早也是最严重的情感创伤。

那个时代的英国，像许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之地一样，人际摩擦细致，等级森严，普通人出头愿望强烈，社会生活气氛压抑。剑桥的空气相对宽容。图灵仍然和少年时代一样害羞、邋遢、鞋带总是拖拉着，衣服皱巴巴。他交不到什么朋友，但有几个伴侣。当时对同性恋最大的容忍和尊重就是“保持沉默”。同性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那些，隐隐约约从古希腊历史中得到一点安慰和回应。

在一次旅行中，相识多年、同为数学专业学生的朋友莫里斯和他留宿在亲友家中。主人并未多想，让两个男人睡在一张床上。

“友谊突然爆出裂痕。莫里斯大吃一惊——他一点也没想到。图灵赶紧道歉，撤回。”也许是因为极度的窘迫，图灵突然愤恨地发作，倾诉起少年时代父亲在印度任职，自己小小年纪被送到寄宿学校的经历。“谁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莫里斯接受了道歉，再也不提此事。

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他和别的同性恋者一样努力而笨拙、最大程度地掩盖自己身上的独特之处，内心还要和主流话语的歧视顽抗。因为无法顺应社会上的多数人，身体、灵魂、自我，这些靠

推理怎么也扯不清的纠葛，无论自责还是自我安慰，都不能获得圆满的解释，使之平静。

## (二) 加密

图灵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二战中的“解密”贡献，其实这也引向对计算机的设想。

二战前，德国的数学和科学成就在欧洲领先，海军用收音机收发信息来交流，波兰军方数年来一直在努力解码。截获这些信号很容易，但你怎么在上千条加密过的信息中读出意思？加密由一个名为“Enigma”（谜）的通信密码机来做。这个模型并不新鲜，战前就有，而且早被商业化了。战争中，它给加了个接线板，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可能性。口令由人轮班掌握，一日数易，几乎没有破解的可能。当时波兰在解码方面已经和德国苦斗许久，仍不能取胜。尤其是，德国人稍稍改动接线，就令解码装置一下子失去了用场。波兰人用的方式，还是以穷举为本，只是速度比较快。

图灵和许多数学家被派往布雷契莱庄园（当时的英国情报破译中心）。在这里，他旧习不改，仍然看上去邋邋遑遑，对他认为不够聪明的高级军官“不够尊重”，宁可和聪明的低级军官下棋。在这个地方，同性恋更是大忌，好在他不可替代，所以被容忍。

而英国人运送粮食的船只总是被德国人打沉。最糟糕的情况下，英军舰队只

有一个星期的供给。解码常年没有进展，损失不可尽数。

最后，图灵和同事们经过长久努力，设计出一种破译机（取名“Bombe”，原意是一种甜食），先排除若干自相矛盾的解读方式，余下的再穷举，一下子快了很多。不仅如此，几台Bombe 环形相连，抵消了插线板所增加的可能性。他们渐渐可以在几分钟内解出一条信息，最终的结果，是让战争提前结束两年。当然，战争时期的研究，实用是第一，无暇顾及理论的严密，而有时实在只能靠无奈的赌注和猜测，政府对战争的预测，并不比公众强多少。二战后丘吉尔下令将当时的二百多台“Bombe”全部销毁。

以上当然仅仅是解密加密史中的一小段。这本传记充满细节，读起来并不太容易，不过，它常常把我带回到当年在校园里读书的回忆中。我曾经选过一门“网络安全”课，记得老师说了句极有意味的话：在工业上，不能用诡计（trick）来实现加密，因为花招迟早被人识破。一旦识破，它就很脆弱，不再有任何用处。那么，管用的、能够持久的加密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在加密被标准化之后，也就是算法已知、解密程序存在的情况下，仍然需要长时间运算才能解开的编码。时间要长到什么程度？理论上说，用现存的数学算法，理论上都不能在可行时间内算完。典型的如RSA，该算法虽然不断改进，但其思想近30年铁打不动，就是因为大质数的幂运算本身有着很高的复杂度。理论上说，你等它算完的成本，高于解开秘密

的成本。或者你算完的时间，比密码有效期还长。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密码被破解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而从小就迷恋解码思想的图灵，不知是否也经历过类似的惊讶和好奇：加密思想其实是有哲趣的。人活着，一边攻破一边设障。最有效的障碍，不是靠小聪明，一个一旦告诉你答案就不堪一击的秘诀，而是靠数字本身的复杂度和无序性来实现的。加密技术多多，基本可归为隐藏，换句话说，是让有序的东西看上去无序，从而无法获得有意义的信息。而意义，不正意味着方向和秩序吗？打乱（不管是人为还是自然）和生成秩序的方法有多种，并且随着人的认知能力的增加而增加。

从二战甚至更早，用统计分析的方式来找规律并解密的方法就存在了——图灵他们也用过。比如某个字母出现的频率，分析多了就可以对应上答案。所以加密也是针对于此。物理中“熵”(Entropy)这个概念是衡量混乱度的，熵值越高越混乱，故加密的理想正是找到一种编码方式，达到比较高的无序状态，让你看不出哪个字母出现频率高，并且在你设想出一条规律的时候来迷惑你，让规律显得似是而非。你看，多数时候科学研究都是寻找规律，但加密则相反，把牌洗到最乱，淹没规律——这当然是为了对付人。所以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转了个圈：你要掌握一个东西，要减低其熵，等你获得它之后要用盾对付别人的矛，也就是增强其混乱度。攻防之间，

此规律输给彼规律——往往是复杂度比较高的规律获胜。

当然，解密也可以不那么正大光明地跟真正的数学问题对决。它可以通过分析时间来接近解密，特别是对某些算法。比如，加密中某些运算，比如耗时较长的乘法，时间较短的移位等等。因为其计算复杂度有差别，解密者分析时间，可以大概猜到到底什么运算进行得比较多。后来加密者想出对策，把这些运算统统改成查表，也就是说，无论快慢运算，索性都改成查表找结果，这样一来，不但加快了速度，还统一了时间。当然，查表也不是万灵药——万灵药是不存在的，秩序和反序之间，从来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对解密的成就，往往带来纯数学研究的进展。

在战争中，这些看上去有趣并纯洁的数学游戏，背后则是暴力、血腥和性命。

### (三) 图灵机

战后，科学家们兵分几路，兴趣开始分散。图灵最热衷的是继续发展解码思想，并制成真正“能计算的机器”，他认为总有一天，人类在科学艺术各个领域都会遇到“机器”的挑战。而写作《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的作者侯世达，在《阿兰·图灵：生活和思想传奇》一书的序言中说，“我怀疑图灵是否真的以为，机器会代替人类。”“彻底了解任何一个人，都不是我们全部的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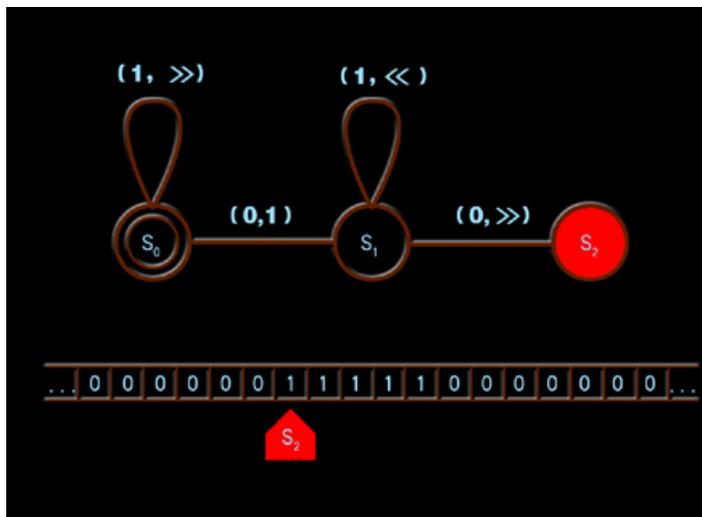
慧所能抵达的一连试图彻底了解自己都只会带来无尽的谜语和矛盾。对此图灵应该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因为这正是图灵机的核心。”

其实，计算机的发展限度，并非图灵所能预料（或者打算预料）。霍奇斯说自己对侯世达的担心毫无兴趣。如今我们眼看计算机飞速发展，笔者对新鲜模型倒有那么点审美疲劳。相当多的时候，最感兴趣的不是人工智能进展如何了，而是这个老掉牙并且不好使的图灵机模型。图灵自己说过，“我的模型只能做非常简单低级的工作。”在场的人大哗，也许潜台词是，“那你做它干什么？”

那么图灵机到底是什么？它的功能很有限，资源就是无限长的带子，有个读写头在一个个孔上左右移动，而孔代表0或1。你可以读之写之，但只能写0或1。读写头的移动方式则根据函数决定，而函数是以过去的状态作为输入，决定下一状态的。同时可以以另一纸带辅助计数，比如在带子A上走三格，在带子B上走一格，并且还可以擦掉某些已写的痕迹。而且，已写的被记住，随时可用。它的能力，基本就这些。

你看，图灵机本身不是计算机模型，而是数学模型，看上去和“电脑”毫无关系。图灵机本身并没有直接带来计算机的发明，但它对计算的本质认识，是计算机科学的基础。它告诉我们计算是系列指令的集合，还有，什么可算，怎么决定，什么可以决定。

如下图：



$S_0$ 表示起始状态，上面弯弯的指回自己的线表示可走无限个1或0， $>>$ 是往右走， $<<$ 是往左走，走到最后如果红点掉进最后那个圆圈，“有限状态(Finite State)”，它就决定了，这个字符串(红点的足迹)是所定义的语言——这个判断正是操作的目的。如果掉不进去，就不是。在这里，语言规则本身指定读写头的移动。游戏规则当然有很多种，但都基于状态导致输出(这种方式引发了庞大的递归体系)，读写头左右移动，所经历的“历史”被判断，和定义相符与否。相符就接受，否则拒绝。

要实现它，只需这样的设备：一条或多条无限长的纸带；一个读写头；一套控制规则（根据当前状态决定下一步走法）；一个状态寄存器（存储当前状态）。你可以对纸带读之写之，但只能写0或1，而且，已写的被记住，随时可用。图灵机后来生出一些“变种”，但它的“智商”，总是限于读写和涂抹。注意，图灵机是虚拟的，只供思想模型之用。

和图灵机相关的一个概念还有，“有

限状态机”(Finite State Machine),也是描述语言之间的抵达,换言之,设计一种从此达彼的路线——也是我们曾经奋斗一学期的事情。那时我们每天的作业都是用铅笔画圆圈和线(你瞧,计算机系研究生有时完全不需要计算机!),表明从此怎么达彼,一般来说,手段是字符串后面连接上0还是1。比如,用它表示所有被4整除的数,要研究被4整除的数变成二进制有什么规律,然后为这样的二进制字符串设计出路线——一个字符出发,中间路过0或1,都捡起来垫在屁股底下,然后越坐越高,转了一圈之后发现自己已经人模狗样,扑通一声栽进某个“状态”,化成语言丛中一滴水珠。

注意,这种模型虽然和“计算机”有关,其思想和途径跟东方古老的算盘完全不同。世界在图灵机中被简化成这个样子,缤纷的变化缩成如此有限的的能力,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此思想模型其实古已有之(比如把计算过程当作“黑箱”的想法),不过图灵是第一个把它系统化、形式化的人,而且为之提供清晰的算法和证明。

你看,它不像算盘那样,以口诀之助提高计算速度,反倒把数字计算“原始化”,好像回到了用小石头在沙滩上计数的年代——正是因为状态简单,所以能和硬件(磁带、晶体管等)接轨,开始了无限制的增长。最终引向计算机科学——最少产生了最多,最原始变成最先进。

从思想来说,图灵机这条无限长的纸带和可以无限进行的读写动作,就概

括了一切纸笔上进行的数字表达和数学运算。这个思维过程,妙在对“等价”的认识。比如,纸带可一端伸展和两端伸展是等价的一前提是不考虑效率。而对效率和空间、资源的忽略,将数学世界的认知推进了一大步。这是用算盘来增加资源、方便计算的思路不能想象的。我们从而关注“可能”、“不可能”,而不是快慢、长短,于是我们看待数学的目光被更新了。从这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图灵和后来的丘奇、哥德尔等人提出的可计算性、停(图灵)机、可判定性、不完备定理等等,掀起一场革命。

而当年我囿于学生的视角,哪有时间去惊叹模型之美?我们最关心的是习题结果和作业成绩。大家都知道,各种科学课程,不做题是学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做题让你明白“场合”和“条件”,听上去非常正确和简单的定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用,要对“条件”有反反复复娴熟区分才可,也就是,要明白A,得知道什么是非A。想想看,图灵机的抽象和了不起也在于此:当年有了图灵机的设想,但没有衬托它的“非图灵机场合”,图灵在黑暗中摸索,从尚未吸收到学术经验中的未知,驶向更遥远的未知。

时至今日,他的猜测,有一些被划分到“非图灵机”——图灵机这个抽象化奇想的结果,终于在无数次的辨识中,转变成“习题”。好在还有一系列后来者,包括彭罗斯,对“图灵”和“非图灵”争辩不休。图灵机的概念仍然是开放而活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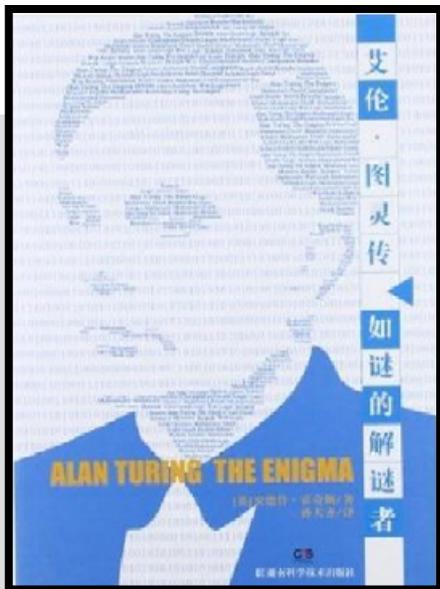
## (四) 停机

除了搞研究，图灵是个段位不低的长跑者，据说最好成绩曾经接近当时的马拉松世界纪录。这个充满奇想的人，却沉醉于这样简单枯燥的运动。他好比一只长“纸带”上的读写头，一生不停地“计算”。计算可以转化，生命却并不如此简单。它不禁错读、无法重写。智慧的生命在简单而无穷的纸带面前悲哀地告负，“图灵机”无言地停机，而他的生命和别

的生命一样，消失得简简单单。

霍奇斯提到图灵之死，其实也有自己的诠释。“你问他为什么死，好比问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发生：某一声枪击，列车时刻表，或者国家情结，可能都是原因。从某个角度看，不过是原子运动而已，遵循着物理定律，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个神话；再换个角度，是不可避免的发生。”在我读来，“不同水平的描述”，让我想起人工智能研究中的人机对弈。其实，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巨大的复杂度，如果你仰头追问，为何同性恋被视为犯罪，为何他们一定要被“纠正”成“正常人”，为何事物总有自己的边界和极限，为何总有些语言要掉落到图灵机之外？我自己的解释是，个体生命之间是不同的，不同的质地和经历造成交流的阻隔。这个社会能做的事情，只是在他死后竖起好几座铜像，英国首相布朗在几千人的呼吁下，2009年正式表示“向图灵道歉”。再有，同性恋早就不会因此进监狱了，而图灵则成了同性恋组织的骄傲。

可是，人生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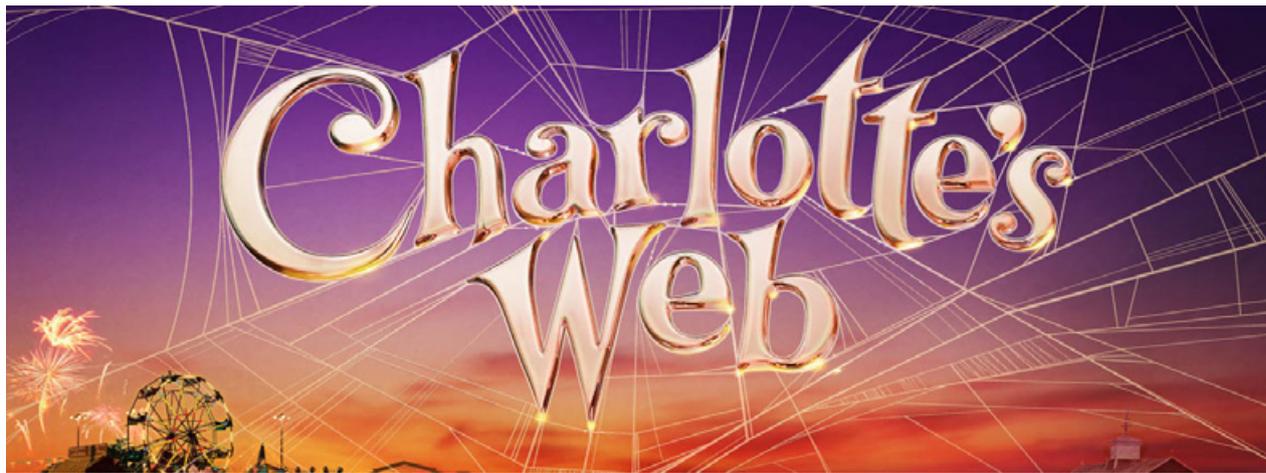
《艾伦·图灵传——如谜的解谜者》  
 (英)霍奇斯 著 孙天齐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年3月

象力、欲望和需求，总是在世上处处受制。

我们都熟悉的丘奇-图灵论题，大意是这样：一切直觉上能行可计算的函数都可用图灵机计算，反之亦然。我们今天制造出的形式化的关系，都来自“等价”的认识。而要认识等价，首先要理解将一个计算过程粉碎到底层的过程。这个论题的哲学意味也非同小可：人性、伦理、社会、历史，是不是都有个事关生命特质的“底层”基础？人群有着惊人的“求同”本能，而社会中的人，时时处处关心“自己眼中的他人之眼”，一些奇异的个体要么被扭曲、被多数人同化，要么被遗弃。

在求同和挣脱之间，我们好比用图灵机来考量的“语言”，用一生来判断自己的归属。Q

# 最早的“微博”和怀特的预言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鸽(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有史可稽,最早的微博发自一个叫北布鲁克林的村庄的谷仓内。六十年前,在美国缅因州艾伦海湾的北布鲁克林村庄,有一个很大很古老的谷仓,有一位叫“微博”(Wilbur)的天真烂漫的家伙,被关在里面。他试图逃跑想获得他的自由,但最终被捉了回去。他想改变自己被屠杀的命运,最终只能在孤独的夜晚独自绝望。就在这个时候,他的朋友夏洛,一位天生的网管和了不起的网民,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夏洛把自己挂在网上,想呀想呀,想了一个夏天,终于想出了搭救她的朋友办法。她在自己的网上,为朋友“微博”写下有史以来最早的四篇“微博”：“好猪”“了不起”“光彩照人”“谦卑”。正是这四篇微博,让“微博”立即得到许多关注,乃至万众瞩目,最终得到了他的自由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要查证这段历史非常容易,因为谷仓的主人E.B.怀特将这段历史写成了一

本书,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夏洛的网》,如今,这本书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发行超过一千两百万册。最近,为了纪念《夏洛的网》六十岁生日,哈珀·柯林斯出版社还特别推出一个纪念版本。纪念版特别之处在于增加了一个由美国童书作家凯特·狄卡密欧撰写前言。2004年,狄卡米欧凭借小说《人鼠之恋》获得美国儿童文学最高奖纽伯瑞奖,这也正是《夏洛的网》出版第二年后,怀特所获得的荣誉。在前言中,狄卡密欧说到:“这本书的魔力在于:在它的书页中,有一些可怕的事情,一些难以忍受的事情发生了。然而,我们忍受了这种难以忍受的东西。而且,最后我们甚至感到欢欣。”而当时这本书的编辑乌苏拉·诺德斯特姆宣称,她没有改一个字,尽管她曾建议将其中一章的题目从“夏洛之死”改为“最后的日子”,不过,作者怀特并没有听从她的意见,坚决不改一个字(可见,这可是无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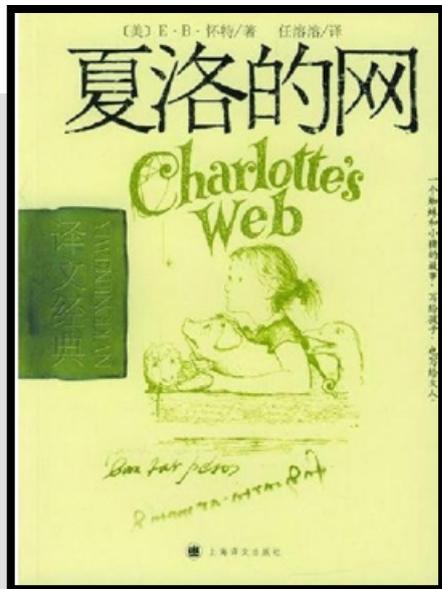
改的信史)。

在新增加的前言中,狄卡密欧说到:

“我不会说它是一本‘童书’,我想它是一本可以给任何人——成人和孩子看的书,他们都可以从中领悟到些东西。”对此,我也想说,我也不会说这是一本童书,因为重看这本书时,我惊奇地发现这是一个预言,形象地讲述了今天在中国微博上发生的一些故事。黑暗中,“微博”倍感孤独。黑暗中,一个声音问他: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这个朋友便是夏洛。正是这位朋友夏洛成为了“微博”的守护神。当“微博”知道了人类“最可耻的诡计”,将他养胖然后杀死他,把他变成圣诞的腌肉和火腿后,不禁嚎啕大哭:

“我不想死,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谁能救我?”他的朋友夏洛回答:“我。”于是,了不起的网民夏洛在自己的网上为“微博”写下四篇微博,从而改变了“微博”的命运。而今,我常常在微博上发现这样的微博,他们柔弱而又坚韧,简短而又睿智。微博上的“夏洛们”如谷仓中的夏洛一样,更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几乎没有外人可以知晓夏洛与“微博”的秘密。然而,如同怀特最后所写到的,在获得自由、有了生命保障的“微博”心目中,无人可以取代夏洛。在我看来,这便是如今微博的意义与原则所在,正是有了许多无数的夏洛,微博在我看来,变成一个温暖的存在。于是,那个羞涩老头怀特,在我眼里,便成了一位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伟大诗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



《夏洛的网》  
E. B. 怀特(美) 任溶溶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3月

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

实际上,比《夏洛的网》还要早三年,伟大诗人怀特还说出了另一个著名预言。1949年夏天,怀特为《假日》杂志写了一篇其最为著名的散文之一《这就是纽约》,在文中,怀特指出那时的纽约,“就像一首诗:它将所有生活、所有民族和种族都压缩在一个小岛上,加上了韵律和内燃机的节奏。曼哈顿岛无疑是地球上最壮观的人类聚居地”,然而,“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纽约无疑有着持久的、不可抵挡的诱惑力。”作为一位纽约出生长大的纽约客,

怀特敏感地体会到：“纽约最微妙的变化，人人嘴上不讲，但人人心里明白。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只须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52年后，怀特的这个可怕的预言变成残酷的现实，此时，离怀特在夏洛与“微博”的农场去世已经16年，人们似乎并没有记起他半个世纪前所发出的预言。

1985年，86岁的E. B. 怀特去世，这位一生在“任何压力下都弱不禁风”、自小害怕出席任何场合的忧郁老人，将其一生的生活主题定义为“面对复杂，保持欢喜”，而“描写日常琐事，那些家长里短，生活中细碎又很贴近的事，是我惟一能做又保持了一点纯正和优雅的创新性工作”。然而这一点“纯正和优雅”的工作，却让《纽约时报》以“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E. B.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作为其讣告，这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待我真正琢磨出怀特预言的奥秘所在时，不得不赞叹这句讣告的精彩绝伦。原因很简单，因为怀特这位可爱的知性的老头的“原则与风范”其实与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只有两个字——“自由”。

1940年7月，在全世界还在为希特勒欢呼或是无动于衷的时候，甚至苏联还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的条约》的时候，已在缅因州农场做了一年农夫的怀特，一向“浑身静穆”的温和的怀特这次却“金刚怒目”，拍案而起，在《哈珀杂志》发表了其最为生猛的一篇文章《自

由》。文章除了其一贯的幽默外，对希特勒的独裁与极权所表现出的愤怒与批评，不仅在怀特的几千篇散文中颇为特立，更是在当时作家中所罕有。在这篇文章中，怀特不仅预见到了希特勒的可怕，更是将隐匿于心的“原则与风范”吐露笔端——“幸运的是，我没有试图改变世界——有人正为我改变世界，而且速度惊人。但是我知道，人类的自由精神一直存在于本性中；它不断再生，从未被火或血抹杀过。”“今天，一个作家在怀着极大的满足感进行写作，因为他知道他将是第一个掉脑袋的人——甚至比政客们的脑袋掉得还早。对我来说，这样更好，因为如果尘世的命运拒绝给我自由，我就会变成行尸走肉，如果被法西斯主义统治，我情愿做一个没有脑袋的人。因为在那种环境中，脑袋将没有任何用处，我一点也不愿承受如此沉重的累赘！”

实际上，终其一生，怀特从来没有写过什么长篇大作，除《精灵鼠小弟》《夏洛的网》《吹小号的天鹅》三本童书外，他只是为杂志写随笔与评论。不过，在怀特看来，作家的角色就是这个社会与时代的“监管者或是秘书”，“今天作家的一个作用便是发出警告。”从这方面说，怀特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预言家——终其一生，他都在仗义执言，维护自由。他不仅是最先反对希特勒与纳粹的人，也是率先反对麦卡锡主义与“黑名单”的人，以及最早强烈反对氢弹试验的人。同时，他更是早早地对人类的环境、生态与食品安全以及技术所带来的危害提出过各种

警告的人。而“自由”的“原则与风范”则贯穿始终。

在《夏洛的网》的最后，怀特写道：

“夏洛是无可比拟的。这样的人物不是经常能够碰到的：既是忠实朋友，又是写作好手。夏洛两者都是。”怀特亦如此。🔴

# 世界开始向左偏转

## —— 欧洲手记



特约撰稿人 吴强 (北京, qiangwu.de@gmail.com)

又是一个冷夏! 六月底的曼彻斯特, 气温只有7到13摄氏度, 不过, 这倒不妨碍奥运火炬接力经过曼城的当晚, 几乎全城市民都兴高采烈地拥挤在酒吧里, 一点看不出气候变暖的迹象, 也看不出金融危机的迹象。当然, 这是置身欧元区之外的英国, 他们有理由幸灾乐祸, 就像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时心怀叵测的欧洲各国。就连欧洲的其他地方, 此刻也正耽于足球民族主义的冲突之中, 人们似乎无暇关心决定欧洲未来的布鲁塞尔峰会。

的确, 自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失败之后, 欧洲就仿佛坠入一个无尽的深渊: 因为内部的纷争而错失了一次改变世界的机会。此后便每况愈下, 气候峰会破产的阴影如同欧洲的梦魇一般挥之不去, 出现在随后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就像今年欧洲大陆的冷夏, 嘲笑着气候变暖的预言, 也让欧洲在戴维营G8峰会、墨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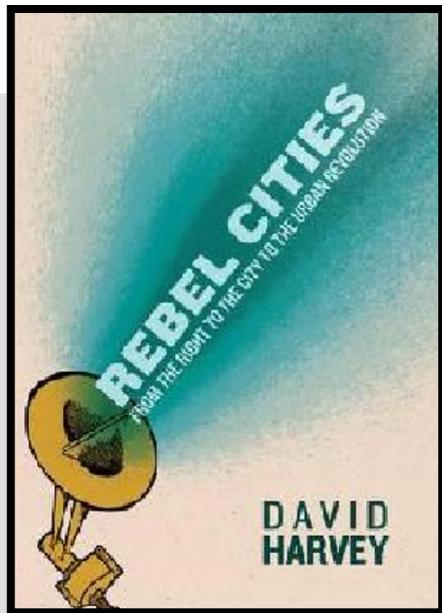
哥G20峰会、里约可持续发展峰会, 欧洲的话语权和政治共识被莫名的力量所绑架。如同世界的磁极已经发生了偏转, 而欧洲却不自知, 因此陷入了混沌。

金融危机自身不可能找到解决的出路, 被金融资本所绑架的国家及其代理人也不可能自动释出他们的绑架对象, 就像德国女总理在布鲁塞尔峰会前夕的警告, “没有什么万灵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作为大资本与右翼力量联盟的最忠实的看护人, 梅克尔一直坚持财政紧缩政策, 不同意发行欧元债券, 也拒绝为此提供最后担保。所以, 相比希腊的两次选举和组阁努力——最终屈服在德意志帝国的欧元霸权下, 法国人却反其道而行之, 选出了反对财政紧缩的社会党人奥朗德。虽然奥朗德的当选仍然可以归之为党机器的产物, 但是法国选民对萨克奇主义或者梅克齐 (Merkozy) 的拒绝, 再好不过地说明了

社会的选择。每一次系统危机都可能催生着新的社会整合，金融危机彻底拯救的唯一出路只能来自金融-国家之外的社会。

对这种通过社会整合而实现社会自救的思想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都只停留在卡尔·波兰尼最多福柯的意义上，并不熟悉Lockwood-Habermas的社会整合思想，更不敢面对革命也是一种保卫社会，激进主义往往才是启动社会自救的唯一机制。从2011年初北非茉莉花革命到以色列、西班牙的大规模抗议再到去年9月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当然也包括在希腊发生的激进行动，一种新的激进主义的全球运动正在兴起，而且改变了日常政治。如同上世纪的大萧条来临，在全球金融危机延烧的五年中，世界的磁极开始向左偏转。

虽说在美洲大陆，这个偏转可能追溯到2008年奥巴马当选之刻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在欧洲，只有当金融危机逐渐深化并引发欧元危机然后整个欧盟一体化的危机，这一偏转才逐渐显现，人们也终于开始谈论起偏转的表象了。比如说，这周(6月25日)的纽约时报，评论人托马斯·弗里德曼撰文称一种“民众主义”(popularism)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粹主义(populism)正在兴起，政客们正在日益受到推特和博客以及民调的共同导引，只是他们也不知道究竟谁在真正引导那些新媒体。还是这周，6月28日，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26个州对奥巴马总统全民健保案的违宪指控。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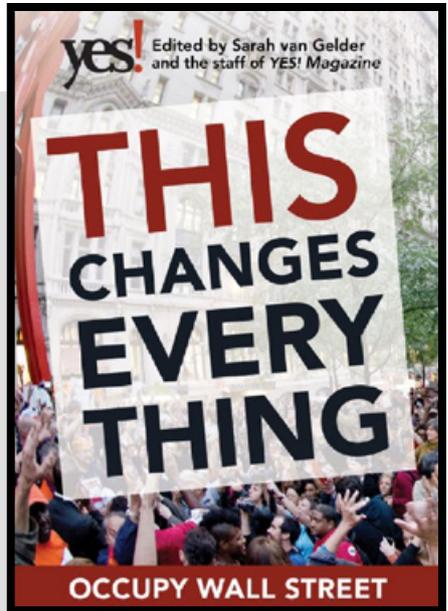
Harvey, David  
2012: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  
London: Verso.

巴马的欧洲式社会民主改革努力在连任关头站住了脚，被最高法院加固了。

所以，对，弗里德曼看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发展。仅仅在过去几年间，世界偏转的关键几年间，这一发展还被误认为一种新的民粹主义。包括2008年奥巴马的当选，特别是法国社会党人奥朗德5月的胜利，也被认为相当程度上唤起了左派的民粹主义，以至于德国乃至全欧洲的社会党人今天都在谈论如何回到19实际社会民主最初的民粹传统上去，彻底摆脱政党的官僚化和脱离基层的倾向。但是，如果眼光仅限于此，恐怕难以理解这半年来欧洲所遭遇的混乱，比如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动

荡,也难以真正理解奥朗德上台的背景和意义。欧洲正在经受她固有的几个伟大传统的相互较量,其中之一,是奥朗德选出的法国自大革命以来的骄傲和价值观,就是平等。他的政策主张,除了反对财政紧缩,还包括效法德国的共同参与制,要求一千名雇员的企业的监事会或董事会里必须至少有一名劳工代表。像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对金融资本绑架国家政策的抗议,继而奥巴马表示声援;萨克奇—梅克尔以来的大资本联盟也开始被无情地扭转,其背后同样由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相似的激进主义在驱动。

且不说奥巴马。作为一位从芝加哥南部黑人开始从事社区工作的激进活动家然后当选为美国第一个黑人总统,自2007年参选以来屡屡被右翼保守分子攻击为共产主义分子,其激进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索尔·阿林斯基(一位在大萧条时代开始投身芝加哥南区的社会运动、美国当代历史上最杰出的激进主义理论家和战略家)以及左派神学,奥巴马自承的三位导师都是受阿林斯基主义影响的公认的激进牧师,我在今年有专门论文追溯他和阿林斯基的激进思想。奥巴马和阿林斯基的亲授门生希拉里·克林顿已经完全遵照了阿林斯基的激进主义原则,实现了激进运动的目标——夺取最高权力,那么如何观察欧洲的民粹主义兴起的背后呢?过去一年里,我先后搜集了四本激进主义的出版物,它们分别隐见于过去几年的历次骚乱、行动、抵抗和城市革命之中,为我们观察欧洲偏转的思



Van Gelder and the staff of YES!  
Magazine  
2011: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Occupy Wall Street  
and the 99% Movements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想驱动提供了重要参照。

第一本是法国“隐形委员会”撰写的《革命将至》,早在2008年巴黎暴乱期间就印行出版。特别是2008年11月发生了160起火车破坏案件后,法国警方在Tarnac逮捕了9名年轻人,怀疑他们是隐形委员会成员,对他们提出指控,而证据只有法国国营铁路时刻表、一副梯子和《革命将至》这本书。这Tarnac9人中的一位,最引人注目者,朱莲·库帕(Julien Coupat),33岁,毕业于法国高等社科院的哲学系学生。他以及这本书鼓吹的是匿名行动,为法国当局所恐慌,因为据此几乎可以重新定义巴黎13

区的暴乱性质，没有暴乱，只有反抗。这种匿名行动是地道的无政府主义风格，另一位朱利安（阿萨奇）这些年来在做的维基泄密，也是同样的无政府主义匿名行动，他在6月份跑到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寻求庇护。

台湾印行了这本书的中文版，去年秋天我访台时购得。当时，占领华尔街运动延烧至台，演成争取各项劳工权利的“占领101大楼”行动。我在101购物中心的占领现场观察、与行动者聊天，对比《革命将至》的策略，台岛上的社运已经相当温和，不能不归咎于民进党执政期间社运能量的减低。与国民党高层的交流也感受到相似问题，他们越来越不愿意直接接触甚或支持大陆的社运活动，两岸的社运与政党间的良性互动空间都急剧萎缩，社运的无政府主义发展是大势所趋。对台湾、埃及、利比亚等等新兴民主化实体而言，重新革命是摆在民主力量面前的急迫任务。

第二本，《时代的愤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书，而是一份不足40页的小册子，不算注释的话，内文只有13页，由现年94岁的法国老战士德·斯蒂芬·黑塞尔(De Ste·phane Hessel)2010年写作出版。黑塞尔，是遗世不多的抵抗运动战士之一，这本小册子自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印行超过400万本，仅在去年占领华尔街运动最高潮的10月到11月期间就卖出了60万本，勘与1968革命期间人手一册的弗朗兹·法农的《地球上的不幸者》相媲美，被称作“就像

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呼吁自由法国开展抵抗运动的演讲”，号召每个普通公民“变成真正的战士，而不只是躺在扶手椅里的知识分子”。

这位1917年出生在柏林的老战士，1941年加入法国抵抗组织、墨林的追随者，进过集中营，见证了法西斯，战后作为外交家与埃莉诺特·罗斯福一起参与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起草，参加过20世纪法国历史上几乎每一场革命和运动，2004年获得“欧洲南北奖”。黑塞尔的主张很简单，感觉愤慨的能力和自由是人的本质。他号召重新唤起抵抗精神，反对金融资本，反对小布什、布莱尔、萨克奇等践踏理想的伪民主主义者，捍卫平等权利。黑塞尔的理想主义鼓舞，“兴奋起来，做点什么”，也因此同时出现在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哲学家乔姆斯基和茶党领袖罗·保罗的海报上。虽说黑塞尔所说的愤慨(Indignation)，在英文版中被译成愤怒(Outrage)，前者更显理性，容易被运动精英用来自我赋权制造出民粹主义的效果，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表达的99%对1%的愤慨；而后者似乎更盲动一些，像68革命的气氛，但却同样合乎美国阿林斯基主义的策略原则：愤怒可能是大众最有力量权力的所在。

第三本，《这能改变一切：占领华尔街和99%运动》，美国《是》(Yes)社运杂志编辑的有关占领华尔街运动始末的文集，也几乎就是一本运动指南，对全球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无疑有着重要

的指导意义。其中，最有趣的，是运动的起源，完全受埃及茉莉花运动的影响，受开罗塔西尔广场运动的启发，一伙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作家、社运活动分子、还有IT民工，在华尔街和百老汇附近的海狸街16号4层楼的一处艺术家聚会的空间，萌发了效仿占领塔西尔广场的想法。2011年7月，他们在加拿大一份独立的反资本主义杂志Adbusters上呼吁，

“你们准备好塔西尔时刻了吗？”当月就得到九万人的响应，随后在海狸16号成立了“纽约市大会”。其中一对西班牙夫妇曾经短暂回国目睹了西班牙马德里5月15日愤怒的两万市民举行的抗议活动，回到海狸16号后与众人分享，开始谋划“一次和平的革命”。约30人规模的活动分子，也就是海狸16号的主要成员，跟2011年2月18日塔西尔广场十万人示威的组织者规模差不多，第一次组织到市政厅抗议消减预算。一位来自希腊的艺术家深受感染，迫不及待地加入进来，将原来毫无固定诉求的聚会变成了一次真正的市民大会，来自威权国家的抗争经验迅速改造了纽约的艺术圈子和社会运动。但是，直到9月17日，也没有人预料到他们选择在Zuccotti公园、自由钟阴影下的聚集，会变成如此吸引人的持续性运动。很大程度上，是拜纽约警察的强力镇压所赐，也因为新媒体的传播和参与，他们的行动迅速上了电视和当地大报的封面，一场示威变成每天继续的占领，并扩散到波士顿、洛杉矶……占领行动的力量，在那些欧洲的



隐形委员会  
2011:  
《革命将至：资本主义崩坏宣言&推翻手册》  
隐形委员会台湾分部翻译  
行人出版社

参与者眼中，来自塔西尔广场、来自希腊和西班牙，他们“不是为了美国经济危机，而是为了世界的危机”。

而最大的危机，推动全球向左的偏转的动力，抵抗或者占领运动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其实不仅是华尔街，也不止是欧洲或全世界的公司对国家的绑架，还有如著名斯洛文尼亚政治哲学家、新马克思主义者齐泽克在现场演讲所定义的，这场席卷全球的运动反对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特别是一个“最资本主义却没有丝毫民主”的世界工厂对世界的绑架。这或许可以解释中国各地城市发生的无数骚乱和抗争，比如最近广东中山沙溪爆发的骚乱，与稍早的新塘、织里

一样，当地外来劳工不再满足于所谓维权手段或者仅仅泄愤，而是集体反抗城市的阶级压迫。在仍然保留乡村集体模式的新塘、沙溪等地，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却被束缚在一个陈旧、自私的所谓农村治理模式中，被整体视作外来者的劳动阶级被迫忍受经济和暴力的双重压迫，忍受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和大资本和地方化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暴力压迫，任何看上去荒谬偶然的导火索都可能点燃这一愤怒，将此“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的不满演变为全面的城市阶级战争，而非简单意义上的骚乱。这也是第四本书，纽约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授戴维·哈维(David Harvey)的《造反城市》一书的主线，事实的发展不过是它的重复和延伸，只要全球资本主义没有真正受到挑战并且被迫做出修正。

如何达成呢，至前为止，至少从布鲁塞尔峰会传出的讯息来看，世界往左的偏转虽然已经开始，但是幻想系统自身做出修正是不现实的，还需要社会的、激进力量创造出各种新的抗争形式，尤其是新媒体和想象力。新媒体的

出现可能最终在网络化过程中形成人类社会的内生大脑，促进和传播想象力和各种抗争的创新，这一社会革命大大降低了传统政治革命所需的组织和动员门槛，使得革命可能加速到来。

在实际革命过程中，连黑塞尔都以94岁高龄的耄耋身躯坚持写作，坚持亲自到大学演讲，最终推动中间偏左的社会党人奥朗德赢得大选，那么，革命最终依赖于每个普通公民都成为真正的战士，而非如我在曼彻斯特办公楼里所见，每日阴郁天气中，都是副阴郁的面孔，唯有清洁工最快乐，与每个人打招呼谈足球，那是福利国家对劳工阶级的妥协结果。重要的，革命进程有赖于每一位社运活动分子发挥出创造力，团结在最有创造力的人周围，就像苹果粉丝对乔布斯的爱戴。因为穿透陈旧僵化制度的边界，打破资本政党的联盟，瓦解全球资本主义，全赖最富有创造力、最具想象力的抵抗，这也是奥巴马精神导师阿林斯基的基本原则之一，绝不按照系统熟悉的方式来行事。而如黑塞尔所说，创造就是抵抗，抵抗就是创造！在这意义上，世界的左派永远是有生命力的。Q

# 香港

## ——十年不变与十五年之变



特约撰稿人 米格（上海，pangming@gmail.com）

“是时候不再伪装了。……实际上，关于香港未来赤裸裸的真相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完蛋。”1995年6月，美国《财富》杂志在距离香港回归不到750天时，以《香港之死》的耸动标题为封面，预言这个英国殖民地日渐衰落的命运。

“好吧，我们错了。”2007年6月，《财富》却登出题为《哎呀，香港根本死不了》的文章，坦率承认自己在12年前的预测有误，认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将会持续繁荣”。

从一个被英国人管治了150多年的地区，变为一个由本地华人作为管治主体的地区，这的确引起不少人的担心：

“香港能否保持已往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香港作为亚洲自由港和国际商业、金融及物流中心的地位能否保持？香港市民能否拥有昨日的言论、新闻、咨询及旅游的自由？”

十五年，弹指一挥间。2012年，香

港在世界银行对183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排名中高踞次席，连续第二年以满分荣登全球最具竞争力经济体榜首，主权评级由AA+提升至AAA，更是连续18年被评为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可以说，十五年来主流民意是“人心思定”的，是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的。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庄严承诺下，十五年来香港的发展与变化，恰恰证明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的强大生命力，也用事实回应了上述一连串疑问。

有鉴于此，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团队在薛凤旋教授带领下，以简洁精炼的篇幅撰写出《香港发展报告（2012）》（下简称《报告》）。与国内其他“蓝皮书”不同，此书不仅从宏观的、纵向的层面描摹了香港在经济、社会、政制、政府管治等方面的演

变过程和发展脉络，而且还以内地与香港关系为另一条主线，重视变迁背后的各种社会、政治、文化和制度因素，思考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反应以及彼此的互动关系，力图总结香港在落实“一国两制”过程中的正反经验，并就香港未来面对的机遇与挑战进行评估讨论、提出政策建议。

## 平静之下的暗涌

在世界经济复苏的大环境下，2004年至2007年，香港逐步消除亚洲金融风暴、SARS等负面因素的影响，GDP年平均增长率高达7.2%。但由于特区政府缺乏创新进取意识、长远的经济政策与产业规划，使香港产业重建和经济转型步伐缓慢，教育与人才培养也未能与市场经济环境变化接轨，香港的经济结构继续过度依赖房地产和以内地企业上市及投资移民计划拉动的金融业，这让香港的经济增长落后于新加坡、韩国、中国内地等竞争对手。在次贷风波、欧债危机等外部冲击下，错失产业结构调整良机的香港经济再次饱受严峻考验。

值得深思的是，虽然香港在2004年至2008年间出现通货紧缩，但基本住屋及食品、日用品等的价格却有所上升；2008年后通胀升温，市民生活在飙升的楼价和租金影响下变得更为困难。董建华的首届特区政府在回归后前3年曾大量拨款开展公屋建设，让房价在“供大于求”的预期下急速下挫，其后



却几乎全面推翻传统的卖地制度以及公屋、居屋政策，转为紧缩土地供应、停建居屋、提高地价等偏向大地产商“寡头化”的做法，政府房屋开支由1999年度的452亿港元锐减至2007年度143亿港元的最低点。

这一延续至今的取向，让城市与经济空间饱受限制，却让所有大地产商的年度盈利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造成高房价、买房难、面积小、居住质量差等严重后果。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在曾荫权政府执政的7年间，香港的住宅楼价指数已经上升了111%，而同期家庭月入中位数升幅却仅有27%！

香港的贫富分化问题，同样引起

图为香港学生近期接受采访时称：“香港教育现状，不太正常。”

（图片来源：苹果新闻网）

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均GDP与瑞士一样高，但量度贫富悬殊程度的基尼系数在2006年已达0.533，仅次于中非共和国；在过去5年特区政府用逾千亿元扶助基层后，贫富悬殊局势却进一步恶化，中产阶级生活同样日益艰辛，基尼系数再升至0.537，创史上最高水平，民间的怨气已不容忽视。

为了平息各种质疑与批评，特区政府屡屡推出退税、减税甚至向永久居民派发现金等优惠措施，却形成浪费公帑的不良先例。不断扩大的教育和福利开支没有考虑到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也未能利用财政效益的功能来有效地拉动内需、发展经济，最终未能发挥促进就业、稳定社会等积极作用。面对财政赤字，特区政府又重在削减公务员开支，既打击了公务员士气、增加了公务员工作压力，还削弱了政府的管治能力与行政能力，可谓得不偿失。

《报告》认为，香港回归后，除了董建华任内初期一些短暂的但脱离传统的“有为政府”举措外，特区政府的施政欲变未变、裹足不前、畏首畏尾，在这十五年间“基本上没有大的进步”。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从20%左右降至15%左右，难怪有批评者认为特区政府的“大市场、小政府”守则已经无所作为地造成“大富豪、小市民”的实际结果。虽然特区政府大体上能保持高效、法治和廉洁，但在准确掌握和应用“一国两制”、检讨自由放任经济理念、快速

有效地应对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满足市民不断提高的要求与预期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可以说，现在的香港社会看似风平浪静、水波不兴，海面下却是暗涌不断。

## 从“人心思定” 到“人心思变”

温家宝总理曾语重心长地指出，“香港仍有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与某些“报喜不报忧”的出版物不同的是，在介绍回归十五年来成绩之余，《报告》率直地提及了这些经济、民生、社会与政制方面“悬而未决的深层次矛盾问题”。“香港回归已近15年，社会仍然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在爱国人士参政、土地房屋政策、教育制度改革、经济策略等问题之外，《报告》着重分析了香港的政治制度不稳定问题。

《报告》指出，在回归后，政治争议凌驾于经济与社会问题，促使香港社会倾向于西方民主模式与议会制度，“并企图以此作为促使内地政治变革的动力”；历届特首均主动削减自己对行政会议与各咨询机构组成人员的任命权力，严重伤害了行政主导的政制原则；《基本法》被利用来作为要求政治体制变革的借口；特首与立法会选举办法久拖未决、不确定性大，让有意参选人士难以知所适从、及早安排；特区政府7次推出政改方案，导致社会对政改

与普选不断产生争执与分歧，政党政治环境初现，社会运动愈发激烈；问责制冲击了中央对主要官员的实质审批权力以及对主要官员不可有外国居留国籍的限制，使中央与公务员系统分隔；区议会的选举和工作更加政治化，加速区议会由地区咨询机构演变成“泛民主化”的地区议会。

总而言之，香港的政治生态日趋复杂，泛政治化影响不断深化，政治结构中的深层次症结与经济、产业结构中的其他矛盾一道，严重阻挠了政府施政与政制改革，制约着社会 and 经济发展。可以说，《报告》这一部分的条分缕析、详述深评，在内地相关出版物中是罕见的。这也正是《报告》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只有不回避粉饰、不讳疾忌医，才有可能找准病灶、对症下药。

相对应地，《报告》也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力求确定终极政制、重建行政主导、平定政治争执、加强立法会的民主成份与组别均衡、建立人才库和政治人才培养机制，确保未来特首与主要官员以国家和香港的利益为重、德才兼备、具有管治能力与广泛的社会认受性，最终保证中央与特区政府的互动、互信、互助。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目前面临的诸多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盘根错节、相互勾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盘计划，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短视眼前、忽略长远，更不应抱残守缺、用过时的办法面对问题。

《报告》尤其强调，香港要在未来发展中抓住中国快速发展的机遇、善用“一国两制”下中央给予特区的一系列特别政策“以政策、基建、土地规划等措施配合中央政府的特别政策，在发展香港经济的同时协助中国的长远经济发展”。

香港已经到了从“人心思定”到“人心思变”的重要关头。新一届特区政府正努力构建“大和解、大团结、大发展”的健康政治生态，顺利实现“稳中求变”的发展目标，逐步解决深层次矛盾。

《报告》开阔的视野、持重的见解与恰当的措施，是与之一致的。

## 从“法理回归” 到“人心回归”

与近来在香港成为话题之作的“地产霸权”、“香港城邦”等书相比，《报告》做到了现象“采样”、社会“标本”和理论“谱系”并重，避免了民粹主义的简单化、脸谱化、标签化乃至妖魔化的写作手法，在献议建言方面做到了厚实平和、简明扼要。但我认为，作为体现“见招拆招”务实精神的港人港文，《报告》还略略欠缺了从更高层面上对内地与香港关系的体察与切认，这实在是一种遗憾。

正如新任特首梁振英所说：“回归有两重意义，一是法理上的回归，另一层则是‘人心的回归’。”所谓“深层次矛盾”，其根源正在于此。由于历史境遇、文化氛围、西化教育、社会制度、法

律制度、经济发展阶段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不少香港人对国家意识、香港定位、《基本法》宪制地位、政制改革路线图等方面的认识还不够清晰。若将其归因于亲中阵营与亲西方阵营的角力，恐怕流于简单粗暴。事实上，这一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背后是香港民众在主体性与认同感上的矛盾与忧虑：应该更多地强调自己在“两制”下独有的主体身份与高度自治的特殊地位？还是应该在“一国”的前提与现实下，坦然接受与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融合趋势，更加义无反顾地与飞速崛起的内地经济全面接轨，努力避免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地缘上“被边缘化”？

这种心结若不能解开，这种困惑若不得释疑，纵有国家对香港的高度重视以及在政策上大力度、高密度、宽范围的全面支持，也只可能导致双方更大的误解与误判。更不容忽视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内地最主要的境外直接投资来源地和境外融资中心，作为自觉护持各种普世核心价值的现代化都市，香港同样曾潜移默化地影响和促进了内地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这种今昔有别、强弱互换、主客易位的微妙情势的深入分析，《报告》是欠缺的。

吊诡的是，这种疏离、区隔与冲突，其责任并不应完全由港人承担。从某种程度上说，对广大内地民众而言，结束殖民统治后的香港依然是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多面向的“他者”：广府文化圈、珠三角经济圈与其他地域；一掷千

金的“新富”们与为了生活乃至生存而苦苦挣扎的“蚁族”；被裹挟进信息化、全球化的年轻一代，尚难有机会走出国门、接触到他种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大多数国民，以及曾经历过大规模逃港风波的老一辈……他们对香港的印象与观感必然差异极大，这又恰恰折射出内地社会群体利益的碎片化倾向与社会结构的断裂化现象。香港，只是我们的一面镜子而已。

在“风景这边独好”的主流话语影响下，内地媒体往往也小心翼翼地、选择性地对“不一样的香港”进行语焉不详的报道，甚至沉默失声。于是，内地民众只能激愤于“地铁骂战”引发的“蝗虫论”，诧异于特区政府叫停内地孕妇在港产子的突兀断然；但他们却全然未能了解，对高铁香港段拨款计划的群起反对，对保卫历史建筑与集体回忆的积极热衷，对每年数倍于本地人口的内地游客的依赖与担忧，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升至十年来的新高，背后其实都是港人彷徨心态与纠结情绪的积聚与爆发。如果任由两地底层民众产生的孤立主义的民粹倾向各自高涨、肆意冲撞，是极不负责的和难以想象的。

## 差异 正是香港的价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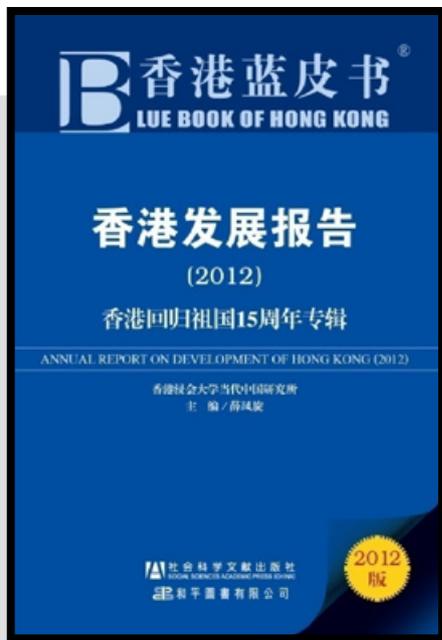
中港关系在这种更高层面上的意义，也是与香港本身的驳杂与多元相连的：它在一百多年内经历了两次剧烈的

身份认同变化。与同样遭遇多次身份认同变化的台湾相比,香港又更多地受到原宗主国的西式影响,更多地被纳入到西方体系中去,同时又更紧密地保持了与中国内地的联系。这代表了一种传统与现代、开放与保守、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碰撞,代表了一种东方与西方的对话。

在港英当局时代,香港虽是大英帝国皇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在整个殖民体系中却依然居于与“中心”地带相对的“边缘”地带,与此同时,香港在与内地的关系中又占据了“先进”地位,即使它从政治上和地缘上说都处在大陆的边缘;到了特别行政区时代,香港的“高度自治”地位得到宣扬、自我意识得以提升,但近年来中国内地的飞速发展,让香港头顶上的光环略显黯淡,甚至开始出现边缘化的倾向。

香港的“他者”地位,体现在中心与边缘的斑驳模糊、主体与客体的错位反差、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交织纠缠。这些矛盾、斗争、张力,既是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却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忧郁所在。

回归十五年,香港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从总体上说基本实现了繁荣安定的目标。这既源自中央政府的全面支持,也是香港同胞善于抓住机遇、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结果。背靠内地的香港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和特殊优势,又得益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持续快速提升、内地与香港在经济领域的整合以及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特殊政策,因而得以克服



**《香港发展报告(2012):  
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专辑》  
薛凤旋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版**

困难、化危为机、持续繁荣。事实上,对于中央政府在多个困难时期“大树遮荫”甚至直接出手襄助,香港同胞也是心怀感激的。

但要保持香港未来长远的发展势头,比依靠中央“输血”来保持繁荣更重要也更有效的,是恢复香港自力更生地创造繁荣的“造血”能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挺港、惠港措施,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支持香港发展的“大礼”。政策的本质应当是互惠、互利,这些政策措施既是促进香港发展的需要,也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需要。香港应充分利用自身在金融业、服务业、法律体系等各方面的优势,在提高区域

竞争力的同时，协助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最终实现中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互补、共进、双赢。唯有如此，才真正是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了“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才真正是证明了邓小平所说的“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

我们理应相信，“东方之珠”承载着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狂飙、科技的升级、基础设施的发达和完善，不仅仅是日渐膨胀的力量、利益与人心，更应当包括精神、思想、观念、文明的软实力、影响力与变革力，应当包括要汇入“一国两制”伟大创举中的民主、自由、法治、廉洁等核心价值。唯有这些，才是促进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最为有力的资源。

从“人心思定”到“人心思变”，从实现“法理回归”到促成“人心回归”，

这正是摆在十五周岁的香港特区政府面前的成长难题。对香港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难以忽视、必须重视的存在。十五年的历程证明，“五十年不变”只能是一种承诺，而不会是一种事实，因为中国在变，香港也在变。中国内地在过去数十年间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甚至比香港曾经或正在经历的变化更为剧烈。但改变终究是潜移默化的、和而不同的。正因如此，差异才是香港最大的价值所在。要实现这一愿景，关键是要做到彼此尊重、相互体谅、求同存异、互利共赢，要弘扬与坚持多元、包容、自省、开放、进取、创新的精神。这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需要面对的考题，还是普通民众应该思考的问题，更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❶



# 寻找孔飞力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鸽 (美国·波士顿, luosiling@gmail.com)

当温文儒雅，一头银发的孔飞力 (Philip A Kuhn) 教授拄着拐杖为我打开贝德福德小镇附近一座老年公寓的大门时，坐了四十分钟地铁再四十分钟大巴，又在雨中走了十多分钟，几次迷路、一身湿透的我，不仅尴尬，还突然慌张起来，有着一一种不真实的混沌感觉：我见到孔飞力了！? 唯有两天前因一场小车祸而撞伤的膝盖生疼生疼。

5月4日，我向在哈佛大学的朋友说：好了，这次我可以采访孔飞力了，请帮忙联系下。在此之前，朋友曾对我几次说起孔飞力，并说他是“哈佛镇校之宝”，这当然引发我的无限向往以及职业病，却无奈师出无名。幸亏不久便得知《叫魂》再版的消息，让我有了采访孔飞力的理由。当天，朋友便将孔飞力的邮箱地址给我，并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我立即咬着笔头也给孔飞力写了一份自我介绍信，并希望能在一个星期后采访他，因为我需要起码一个星期的时间准备。那时，对于孔飞力的所有认识都来自从复旦庆云书店淘到的一本遥远的小书《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显然，对于一次采访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一边等待着回信，一边重新看《叫魂》以及相关资料写采访提纲，并请国内两位大学历史系老师帮我审查提纲。显然，这份“人云亦云”匆匆写下的提纲是





非常糟糕的；更糟糕的是，迟迟没有得到孔飞力的任何消息。我不得不开始对朋友施压，请发动一切力量帮助寻找孔飞力；同时，我重新开始收集资料，重新准备采访提纲，开始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寻找。

5月15日，朋友转来他的第一位朋友的回复：孔飞力最近身体很不好，而且他去年就搬去老年公寓居住了，很少出来。试图联系孔飞力最后一位博士生，但email似乎已失效。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看1977年9月19日，孔飞力的老师、史华慈教授给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写了一封推荐信，在信中他说道：

“如果以我个人的倾向来界定孔飞力教授，我认为他的研究是精当的，因为虽则如此，他的研究领域决不是狭窄的。他的第一本书就奠定其在19世纪中国地方政治和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先驱地位。目前他又企图把研究领域拓展到20世纪。正巧研究生们对当前许多对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大规模全球性的一般性泛泛而谈深为不满，他们渴望研究区域的、地方的、乡村的历史。当然我极力推荐孔飞力还不仅仅是基于他的研究领域比较‘时髦’，更是由于他的作品显示出他的惊人的博学，一种对于理论和比较方法的深切的关注，以及优秀的智力精确性。通过某种非同寻常的方法，孔飞力将历史学这种方式与对人类意识生活和知识分子历史运动的深层关注结合起来。在他新近一篇题为《太平理想的起源：中国叛乱的

跨文化考察》(《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1977年7月)中，我们可以发现孔飞力关于19世纪早期太平天国宗教观念和地方政治社会状况的敏锐而细致的分析。孔飞力教授目前正指导着一项研究中国20世纪地方政治史的计划。孔飞力的学生都爱戴他，他在芝加哥大学表现出了特别出色的教学和行政管理的才能。我坚信孔飞力教授必将卓越地保持哈佛近代中国史研究的领先地位。”

这封信编号为“ACC#14133, BOX16”至今保留在哈佛档案馆，也正是在这封推荐信下，1978年秋，博士毕业后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十五年之久的、45岁的孔飞力重新回到了哈佛大学，这一次，他是接替老师费正清接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授职位的。也正是在这一年，孔飞力加入了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10卷《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的撰写。接着，1980年至1986年，又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在学术界，他被认为是第二代美国中国学学者代表之一，甚至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费正清的接班人。比孔飞力小一岁却早五年入费正清、史华慈门下的师兄保罗·柯文，在其1984年出版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对师弟孔飞力的评价几乎与他们的老师史华慈一样。在他看来，孔飞力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几乎体现了当时美国史学新思潮新取向的所



有特点，“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与费正清、列文森等第一代中国学研究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不同的是，孔飞力为代表的第二代研究者则“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也正是在1984年，51岁的孔飞力再次来到北京，发现了乾隆时期“叫魂案”的资料。1990年《叫魂》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年即获得该领域最高奖“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评语是“本书对于专制统治的原动力作了细致、强有力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而另一位著名美国中国历史学者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在《纽约书评》中给予的评价是：“一位在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历史专家所写的关于东方古老国家的伟大著作。”这正是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孔飞力。

无论是学术成就还是行政工作，在我看来，孔飞力都俨然是一代学术宗师，这不仅增加了孔飞力在我眼里的神秘感，也越发激起我寻找他的欲望。我一方面继续向哈佛的朋友加压，让他再找找孔飞力的学生或是朋友；另一方面，我亲自跑到哈佛校园去问，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孔飞力的其他联系方式；与此同时，我还发信给曾在波士顿做过访问学者的国内朋友，问其是否有可能帮我联系上孔飞力。然而，寻找的结果只是更加增添了孔飞力的神秘。5月18日，在发出求助邮件后，我按耐不住跑到费正清研究中心、

罗宾逊楼里的历史系以及与哈佛燕京学社共一个楼的东亚系里寻访了一圈，除开终于分清楚了这四个机构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地理位置外，一无所获。当天晚上，我收到国内朋友转发来的邮件，邮件说：“孔飞力是一位非常低调的人，每次来波士顿，我都是通过邮件联系，然后在办公室与他见面。实际上，我也没有他的电话。”我再三对照这位教授给我的孔飞力email地址，确实与起初我的朋友给我的、后来我在哈佛历史系网页上查到的以及在历史系问到的email地址一样。我开始陷入绝望。可是除开等待朋友们以及朋友们的朋友们的消息，只有继续在文字资料中寻找孔飞力。

幸亏，孔飞力既非是那种著作等身的“大学问家”，也非那种“出口成章”的“公共知识分子”，自1964年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到芝加哥大学任教起至今，其近50年的学术生涯只不过出版了四本书，除开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和《叫魂》，还有两本著作。一本是2002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本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变迁的小书，是其1994年在法兰西学院讲学时的四篇讲义的结集。书的扉页上写着“纪念本杰明·史华慈”。另一本则是2009年出版的《他者世界中的华人》，这是其90年代中期之后海外华人移民研究的集成。在涵盖了一千多种学术期刊和超过一百万图像、书信以及其他资源，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学术资料库之一JSTOR中，



输入关键词“Philip Kuhn”时，只显示了71条条目。我仔细查看了下，其中四篇为学术文章，分别发表于1967年、1977年、1984年、1995年，依次为《太平叛乱时期的团练地方防御系统》（《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太平理想的起源：中国叛乱的跨文化考察》（《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区域研究与原则》（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公报）、《中国现代国家的观念》（《哈佛亚洲研究》），即便这四篇文章作者均为孔飞力，那几乎是十年磨一剑。此外，1篇为“Philip Kuhn”纪念1999年11月去世的史华慈教授的文章，20篇为“Philip Kuhn”所撰写的“review”（书评或是评论），30篇是其他人撰写的关于“Philip Kuhn”的“review”（书评或是评论），其余16条与“Philip Kuhn”几乎没有多大关系，只是文章提到这个名字。而在《纽约书评》网站内搜索时，只发现1991年5月魏斐德发表的为《叫魂》所写的一篇书评《古老中国的巫术》（That Old Chinese Black Magic）。除此之外，再除三个百科上的简单介绍之外，我所能找到的只是1989年12月19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条孔飞力母亲的讣告。从这条讣告我才知道，孔飞力的母亲原来不仅是一位作家，还是1920年代《纽约客》杂志和《现代历史》杂志的编辑。1931年，她与孔飞力的父亲结婚，而当时他的父亲是《纽约时报》伦敦站的总编辑。1933年9月9日，孔飞力正是出生在伦敦。

然而，资料中的孔飞力越发丰满，现

实中孔飞力越发遥远。5月31日，哈佛朋友转来第二位朋友的迟迟回信。原来这位教授最近正忙着从波士顿搬家去加州。他说他自己至少有一年没有见到孔飞力了，而且他自己也曾联系过孔飞力，但没有联系上。幸运的是，他有孔飞力最后一位博士生的email。然而，晚上我便接到孔飞力最后一位博士生的回信，依然是没有任何消息，让我感到无比气馁，决定彻底放弃。

第二天起来，我依然有些不甘心，于是决定再次去哈佛校园碰碰运气。这次，历史系二楼办公室里一位和蔼的女人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讲述，然后拿出校园黄页，打了两个电话，然后对我说：“我建议他给你写信，我给你他的办公室地址。”说完，在一张便笺纸上给我写下孔飞力办公室的地址。于是，那天下午，我拿着那张小纸条在哈佛校园里转了两大圈，却没有找到孔飞力办公室所在地。我当时真有些怀疑这个地址是否正确。因为上面写着孔飞力的办公室在东亚系，而这个东亚系与我之前所去的东亚系不是一个地址，我试图按地址找到办公室所在，可是奇怪的是，我怎么也找不到那一条路。两个小时后，我不得不放弃，因为夜幕已经降临，我又开始迷路。

6月2日，我一边看着资料，一边给孔飞力写信，将自己的寻访过程以及采访目的诉说了一番。6月3日星期天，在教堂做完礼拜后，我央哈佛大学另一位朋友做向导，与我一同寻找。这一次，我们先奔去与哈佛燕京学社同一栋楼的东亚系，然后再跑到哈佛



燕京学社所在的另一栋楼，然后折回再沿着校园主干道kirkland路一路找寻，突然被我发现了隐藏在其间的那条小路。原来，孔飞力办公室所在的东亚系坐落在私人住宅区内，从外面看，完全是一栋居民住宅，待我绕到房子后面才猛然发现，原来辛苦找了半天这个东亚系，就在哈佛燕京学社与东亚系的那栋楼的后面，两栋楼背靠背，中间有一条小暗道相连。明知这个地址能联系上孔飞力的希望也挺渺小的，但我依然有些欣喜，立即在哈佛校园科学中心的电机房里，找了一位在写论文的同学帮忙，将我写的信打印出来（在校园外的打印店中打印非常贵）。第二天一早，我便去了邮局，按着地址将自己的信与最后一线希望发出。回家后，立即将这封信email给了孔飞力，然后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努力。因为这一天是6月4日，我找孔飞力刚好整整一个月。此时，我已经不抱希望也不能再抱有希望了，我已经决定接受编辑的意见，仿照法拉奇的《寻找玛丽莲·梦露》，写一个《寻找孔飞力》。

然而，奇迹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或者也许只有意想不到的才叫奇迹吧。第二天下午，突然发现邮箱中有一封回复，显示发信人为“Kuhn”。一时间，我呆了好几秒，之后狂喜才慢慢涌上心头。在邮件中，孔飞力解释说，这段时间一直病着，无法看邮件，也无法出门。而他对《叫魂》再版一无所知，但表示现在随时可以接受采访。同时给了我他的地址，原来，孔飞力住在距离波士顿15英里（24公里）的贝德福德

小镇。邮件中，孔飞力还向我保证，“即便你已经回中国，我保证我们也能弄出来。”这句话让我顿时觉得一个月的辛苦已经得到了所有的回报。我立即大呼小叫，发邮件告诉国内的编辑与哈佛的朋友，我终于找到孔飞力了，我终于找到孔飞力了！待高兴劲头过后，我才调匀呼吸，给孔飞力回信约采访时间。于是，一个星期后，我背着电脑、照相机、录音笔以及路上的干粮，手捧着红玫瑰，全副武装出发了。

采访在孔飞力的小公寓里进行了整整三个半小时。已近耄耋之年的孔飞力虽然说话缓慢，思维却非常清楚活跃，且幽默风趣、直爽痛快。对当下政治时事，尤其是美国与中国的时事，异常关心。公寓里散落的书，也多与其历史研究和中国有关，在其客厅的小书架上，还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在客厅沙发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副精美的巴斯海峡地图，“那是塔斯马尼亚岛，漂亮吗？”孔飞力问。边上则是一副澳洲中国农场的画像。1990年代中期之后，孔飞力的学术兴趣转向海外华人移民，而这正显示了其他晚年的学术兴趣。作为一位美国知识分子，他对美国的批评异常激烈，时不时“damn it”一下，甚至一次动用了“bullshit”（废话，放屁的意思），这让人不禁莞尔；而对中国的态度，一如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态度，认为始终需要尊重中国独特的传统，虽然一些问题确实让人义愤。在小客厅的正前方，挂着一个大玻璃框，里面夹着的是2008年11月5日的《纽约时报》的头



版，那一天，奥巴马击败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当选为美国第44任总统。其封面报道正是《奥巴马：扫除种族障碍的决定性胜利》（OBAMA: racial barrier falls in decisive victory），配有奥巴马一家四口的照片。采访结束之时，我问孔飞力：“为什么挂这个奥巴马在这里？”孔飞力笑答：“我喜欢呗。”

采访结束后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整理采访录音写稿，然而，随着稿子的渐渐成文，起初的成就感渐渐变成一种挫败感，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最辛苦最认真最成功的一次采访，但也是最糟糕最失败最无知的采访，稍不留神，孔飞力便消失在历史深处，无处寻找。

### 孔飞力：“我不相信有完美民主”

**时间：**2012年6月13日（约11:00——2:40）

**地点：**美国麻省贝德福德小镇孔飞力公寓

**孔：**孔飞力，海外汉学家

**郭锐：**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问：**罗四鸽

**注：**采访用英文进行，罗四鸽做初步整理，郭锐校正。未经孔飞力审定。

**问：**您是怎么发现“叫魂”案的？

孔：1984年我去北京，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收集资料，接触到了一批乾隆年间的官方档案。当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叫魂”两个字，我当时的研究课题和叫魂没有关系，乾隆只是我需要考察的对象之一。我从没有听说过“叫魂”。刚才我在吃药的时候还想，其实我对中国官僚体制以及内部运行知道的是多么少啊。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叫魂”。“叫魂”案之所以会引

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的材料比较完整，从开始到结束的档案都有，这是一个理想的案例，非常值得研究。这是我的荣幸。因为那六个月的案情的情况……我用英语都难以言表。很小的细节都有，这让我得以与这些材料进行对话。所以，我决定做它。

其实，只要你看到乾隆如何将按主题分门别类存放这些档案资料，你就有可能明白官僚体制的运行。这其实可以参看一下我在书后面所列举的参考资料与书目，从269页到271页（英文版《叫魂》的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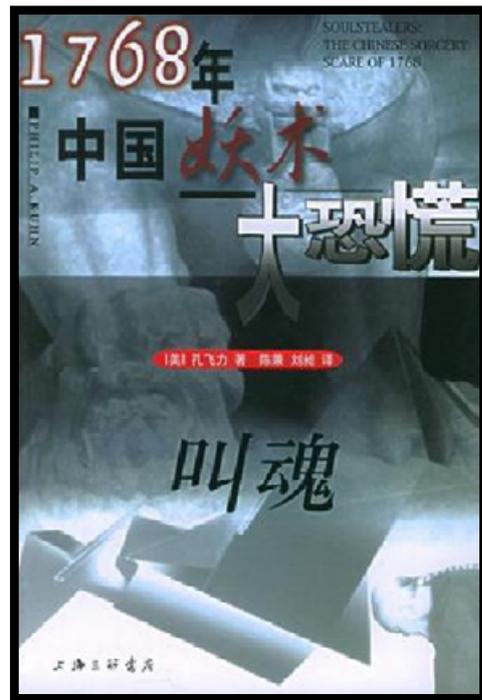
码)，这上面列举的资料，我都一一亲自阅读审查，尤其是税收等级。做乾隆的研究，无论是“叫魂”或是别的，你必须知道如何进入这些档案，并明白这些档案的意义。

**问：第一历史博物馆在故宫，那么当时您住在哪里呢？**

答：那时，我住在博物馆东边不远的的一个宾馆里，那是一个苏联风格的建筑，估计现在没有了。我每天骑自行车，到故宫里的博物馆查资料，因此我每天都会骑车经过皇宫，那时，我就会想，若是我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官员，未经许可看这些国家收集的这些档案，我岂不是很快就人头落地？不管怎么说，那段时光真神奇。我想，这就好像我可以看见毛主席亲手写的一些命令，做这个，那个，还有那个，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问：您当时呆了多长时间？**

孔：我在那里花了八个月时间。那些时光是值得的，当然，有时想理清这些材料，确实很困难。不过，我当时是这么处理的。我回美国的时候，我的行李袋中装满了这些档案的复印件。我有一个中国朋友，是mit的教授，他知道如何建立数据库。所以，他特意为我做了一个数据库，因此，我可以说出每一个档案是谁写的，谁看过，是关于什么问题的命令，是什么性质的命令，



其结果怎样，谁是接收者等等。

此外，当时还有一篇博士论文《货币与社会——十九世纪初中国的货币危机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后来出版了。这篇博士论文对于理解这个官僚体制的运行非常有帮助。作者林满红是第一个系统研究了清代皇帝朱批的著作。

当时我还读了那本书。你读过这本书吗？

郭锐：没有，但我现在听了您推荐我很感兴趣去阅读。您是说，如果有这本书做参考，可以更好地帮助了解“叫魂”？

孔：是的，那本书让我更加明白这些档案系统是如何操作运用的。



## INTERVIEW

郭锐： 刚才您将第一历史博物馆看到的资料与毛主席每天颁发的指示作对比……

孔： 是的

郭锐： 这个比较很有趣。您当时怎么会觉得这与您研究的乾隆时期的案子、官僚体制的作用有一些相似……

孔： 不是一些相似，而是非常相似。

郭锐： 您在研究乾隆时期案例的时候，内心又是怎么理解现代官僚体制？

孔： 我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两者情形很大不同。不过，两个时期的权力文化区别不大。

问： 那么20年后的今天呢？有变化吗？

孔： 我无论说什么，都肯定会被误解，因为……顺便问下，你们读过基辛格的新书《中国》吗？再没有比获得一个完美地保护人权的制度更难的事了。比如，我们都知道，砍头这种做法哪里都有，但怎么做，与各国解决纠纷的文化背景有关。我非常推荐基辛格的这本书。他受到的职业教育不是汉学，但他却明白这个背景。他在尼克松政府或是福特政府时，都努力让人明白一个背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美国人也不是

中国人。这样，无论哪一边都会有一种奇怪的双重性，你就会发现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

郭锐： 基辛格虽然不是汉学家，但他作为外交官，也认识到了，两个国家的权力文化的差异。那您怎么看基辛格说中国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体制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说对美国政府现行的外交政策而言，没有对这种权力文化的差异有足够的重视，就是太天真？

孔： 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比中国和美国区别更大，或者说完全相反。

郭锐： 现行的美国外交政策，就是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没有足够理解到这一点吗？

孔： 是的

郭锐： 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们的努力是让大众和中国执政党相信，普世价值在当下的中国也可实现。考虑到很多时候美国是被看作普世价值的代表，他们有时会认为中美两国的实践是可能会走向一致的。您怎么看呢？

孔： 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最后一行，我这么说的“Many Chinese now think it can. If so, however, we can expect that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al agenda will still be addressed on China's terms, not on ours.”

不过你也可以做另一种解读。20年前的文本在今天不必有一样的意思。你看到这个维权律师、那个维权律师所遭遇的，你不得不感到愤怒。陈光诚事件就处理的很好。可是换个角度看，他的家人、他老家村庄里的人还是继续受到虐待。新增加的处理问题的灵活度没有包括这些人。陈被允许来了美国这件事，我感到惊喜，我为他村子里的人感到难过。如果把这件事看作一个典型例子，中美双方应该达成一种共识，就是两国要和平相处的话，有时真的不能太按照常见的规则行事。因为事情本应如此。你怎么看？

郭锐：美国在这个事情上显示了她的道德力量。我更感兴趣的是对自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的意义。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作为执政党，它应该也可以让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但你说中国有它悠久的独特的权力的传统和文化。你怎么看，这些自由知识分子思想家他们的想法。你从局外人的身份看中国是独特的，但对内部人来说，他们不认为是独特的。我们不希望它是独特的。

孔：当然。如果我是那个中国的维权律师的这点是，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你若是看这个现实世界，你能发现多少个完美民

主的例子呢？比如说关在监狱里的穷人，大概有100,000到200,000，具体数字我不太记得了。监狱装满了穷人，这是非常丢人的事情。我们从高中就学，人人生而平等。但看看今天的世界，这完全是假的。。事情没有不是这个样子。你必须考虑教育、年龄、社会价值等等，这些都让平等变得难以实现。美国的民主里，近期最高法院判决的Citizen's United打开了金钱干涉政治的大门。我们都需要去面对我们的困难。

我强烈推荐一本书，Brill新近出版一本法国学者研究中国民主的书。这是一本历史著作，也是社会科学著作，可能这个夏天会出版。我为这本书写了一个简短序言，在这个序言里我基本上没有对完美的民主这个想法有好的评价。法兰西学院的一位学者研究表明，二战之前的中国是个人权比西方国家更好的国家。

你认为美国是实现了完美民主的例子吗？

郭锐：我不这么认为

孔：我也不认为。各国都有自己的问题。

郭锐：很有趣。我发现你的历史写作常常是被当下问题所引发的，被当下中国问题或是美国问题所引发的。

孔：是的。比如意大利，很难说那里



实现了完美的民主制度。

郭锐：有个美国朋友从中国回来告诉我，中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我说，何出此言？他说，你开车在路上有完全自由，不必遵循任何规则。

**问：还是回到《叫魂》好吗？**

孔：好的。在谈论《叫魂》之前，我想强调下最后一章，就是第十章。这一章非常重要，这是一个结论。作为独裁者的皇帝实际上如同生活在狭小的空间，官僚则是皇帝不得不依靠的。统治一个国家，没有官僚制度不行，但这不是赞扬官僚。

**问：文中最后你说你还是为官僚制度发出“谨慎的喝彩”，认为官僚制度“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了它，也就“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孔：别忘了，当时这句话写于文革刚刚结束。中国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换一句话说，那时的中国确实需要邓小平这样的人。没有邓小平或是江泽民这样的人，中国可能会陷入可怕的境地。当然，我并不是说邓小平是一个完美的领导者，他当然要为他最后几年所做的负责。

郭锐：您的意思是说毛是独裁君主，

而邓小平、刘少奇正是官僚体制力量的代表，是可以制衡独裁统治的力量，两者的关系就像两百年前的君主与官僚。

孔：正是。

郭锐：所以，你从这个立场出发，说明君主官僚制的价值，虽然不是完美的，但若是有这个，是可以有制衡作用的，比文革那样的好。

孔：当时的中国依然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文革既然可以发生，就有可能再次发生。这也不是中国的特例。你可以看欧洲的对犹太人的屠杀。你觉得他们可能会再次发生吗？我觉得会的。当然会的。你有一个普京或是别的什么人，那么你可能就会有无数个小普京或是别的什么人。历史就会重演。

郭锐：那我可以问下薄熙来的案子吗。这个问题可能会给删掉。温家宝总理说，我们要从文革中吸取教训。我们不想文革再来一次。那就是为什么会把薄熙来拿下。这似乎和你的看法有些相似，薄熙来的做法就是对这种官僚体制的破坏？你认为像薄熙来这样的人，有可能重新发动文革吗？

孔飞力：确实可能。你不这么认为吗？如果没有人阻止他的话，难道不可能吗？



郭锐：我可能不会这么认为。我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只是用其一切方式，不管什么方式得到他所想要的，他甚至不是一个毛主义者，我不认为他真的想发动文革，虽然有可能他真的可以发动。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

孔：无论如何，这个前景并不好。政客如果倾向文革的话，不是什么好事情。

郭锐：是的。我同意。

问：网上有一篇余英时针对这件事的文章《薄熙来事件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缺点》，他认为这件事情是“赤裸裸的钱跟权”。看上去，中国现在更糟糕？

孔飞力：中国的官员只是把他们的特权用起来而已。有些美国人喜欢指着他们说，你看，那谁的儿子，开着豪华跑车，上贵族学校。但中国的官二代是对美国社会的复制。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人存在。你认为老布什的儿子真能考取那名牌大学吗？

郭锐：您是评论纽约时报上个月官二代现象的报道？

孔：对。美国自己有巨大的社会问题。罗姆尼说，美国不欠穷人什么，不需要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个富裕的国度对待自己的穷人的方式，是人类历史上的丑闻。我可能

跑题了，你可以接着问准备好的问题。

问：据说，您最早的兴趣是人类学？人类学知识对您的治学有何影响？

孔：这种说法可能不够准确吧。我没有主修过人类学，但我会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做分析。比如《叫魂》这本书中，有许多当时社会里对“叫魂”的认识。

问：美国学者柯文写了一本书，叫《在中国发现历史》……

孔，我同意的他的看法。在中国发现历史，这只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做法。我忘了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不过，在我看来，当年面对中国两千多年历史时，你很难说讲社会学与历史学清楚，你甚至很难用一个原因去解释一个事情，不仅是人类学，其他社会科学都无法分开。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地域辽阔，它还有西藏还有蒙古，蒙古。你若是没有各方面的分析，反而将知识人为割裂是不对的。

问：那你为什么选择了“叫魂”这一年吗？

孔：我觉得你可以仔细的再看看《叫魂》。与这个案子同时代，有不少类似的、甚至影响更大的案件。《叫魂》这个案子并不是独一无二、或是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唯一特别之处的地方是它的资料非常完整，没有别的案例有它这么完整的资料保存在那里。我真不认为叫魂案是当时独一无二的。

郭锐：您也许是注意到这个案子里表现了官僚体制内部冲突和矛盾？

孔飞力：对。它还涉及到满族政权的合法性：谁也不许对满族人的辫子随随便便。

问：《叫魂》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一部成功的著作。“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评语是“本书对于专制统治的原动力作了细致、强有力却依然十分准确而又得体的探讨。”书中所探讨“专制统治的原动力”是什么？

孔：我不知道这个评语，也不是很明白这个意思。我真的认为这本书得到这个奖，只不过因为没有其他人这么做。我想若是其他人得到若是看到了那些资料，也是可以获得这个奖的。我不认为我应得这个奖。史景迁的著作如果当年出版，也许一样地讲。如果谁知道呢？

问：在《叫魂》中，您对这个时期的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之间的博弈作了精彩的剖析，在这里，您能用了一个“政治罪”，请问何为“政治罪”？

孔：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公开的造反，任何对统治、对体制的反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罪名。政治罪不是当时的说法，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那就是我为什么会打上引号。

问：在“叫魂”案中，“政治罪”可以理解为是弘历或是说专制权力，出于政治安全的需要，来控制官僚或是常规权力的一种手段吗？

孔：不，我并不这么认为。你是知道《大清律例》的。有些犯罪比如谋杀，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和典型政治有关的。比如一个儿子杀死父亲，只不过是civil business。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对于弘历来说。他不想看到任何人对满族的辫子有威胁。在《大清律例》中，“谋叛”归于“十恶”条款之下，对于这个范围广泛的罪项所作出的唯一澄清是“这指的是“谋反本国，潜从他国。”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削发令本身并未作为单独的条款或子条目出现在《大清律例》或《大清会典》的任何一个版本中。不过，他们推行这一法令的态度多么坚定，却仍希望把它留在正式成文的法律文本之外。

问：在《叫魂》中，除开专制权力（皇权）与常规权力外，您还讲了第三种权力，即底层老百姓的对权力的渴，并在注释中引用了一个老红卫兵的例子。您似乎认为底层民众对



权力的渴望是造成这次大恐慌的原因之一。不过，我觉得普通民众对于“叫魂”的恐慌更多是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孔：这两种可能都有。有时，这是很难分开的。我们在审查叫魂案带来的恐慌时，在问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会有很多原因。这就是我第二章试图要说明的。整个社会竟然感受到同样的危险，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权贵竟然受惑于同样的不测，这本身就暗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有着紧密内在联系的文化网络。然而，农民、官僚和皇帝的生活方式不同，他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也不同，妖术恐慌对他们形成的冲击也不尽相同。这这里，统一性与多样化是并存的：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形形色色的事件分别发生在最高层与最底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社会就像一面多棱镜，将人们对叫魂的看法及各种各样的色彩反射出来。我们也必须对国家政治领域中种种有关十八世纪生活的晦暗不明的观念进行探讨。

郭锐：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您的看法是，清代妖术恐慌中民众的举动和文革时的红卫兵的狂热有共同之处。

孔：也许我应该表述的更清楚一些，我并不认为这种疯狂是中国独有的。比如说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和这个也非常相似。我想我在书里说，就像把上了膛的枪放在

大街上，人们拿起来互相攻击。

问：不过，您在书中第二章《盛世》中，还是对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尤其是人口问题做了许多分析。此外，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您在考察清王朝的衰落与群众性“叛乱”活动的原因时，也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源与人口比例失调的问题，认为仅人口爆炸本身就意味着“中国传统社会某些新灾难”。

孔：很多人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问：是的。中国的汪士铎、罗尔纲也做过人口方面的研究。6月7日去世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的《中国人口的研究，1368—1953年》（1959年出版），被视为是美国中国学界研究中国人口史的扛鼎之作，是吗？

孔：中国的人口研究依然没有很好的被理解。何炳棣的人口研究我相信可能会真的很好，不过，我更愿意推荐美国另一位人类学者George William Skinner（中文叫施坚雅——笔者注）研究，他是不太同意何炳棣的观点的，他比何炳棣的研究更有体系的多，他针对不同省份有更加精确的计量，采用了更加精确的数学统计方法。与何炳棣的研究相比，我更敬畏他的研究，虽然他在某些地方也有一些错误。我对何炳棣不是很了解，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故事，我是听他的研究生说的。他的学生对他说，何老师，如果你在清朝，你肯



定会中进士。他说，进士？我肯定是状元。

问：《叫魂》非常好看，有些像间谍小说，尤其是其中对“信息”争夺与控制，你起初是对乾隆时期的通信系统感兴趣而去查阅档案的，是吗？

孔：是的。

问：我发现，不仅弘历有着绕过常规途径获取信息的方法，如密折，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官员们也同样有他们自己的办法获得有关皇上的信息。似乎信息的控制也是一种权力，甚至是安全的保证。在如今的信息时代，信息获取与传播方式的改变，“信息”的作用和性质会不会有所改变？

孔：这要看得到的是什么信息？如今信息虽然多，但不一定在大众里传播的都是真的，比如说，在美国大选过程中，有人传奥巴马的出生地问题。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情，有出生证明，但还是有些傻瓜对此胡言乱语。人们选择相信信息的来源，所有信息的来源还很重要，要看来自哪里。中国不是有一个词叫“小道消息”吗？

问：这次出版的学术系列重，除开《叫魂》外，《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与《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也将出版，能不能介绍下这两本书呢？先说说《中华帝国晚期叛乱

及其敌人》。这起初是您的博士论文吧。

孔：是的。

问：1940年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出版，认为中国是“无兵的文化”也是中国积弱的原因，而您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两大基本类型的民兵制度〔国家民兵制度和地方自发的民兵制度〕的考察，是想驳斥雷海宗的中国文化是“无兵的文化”的观点吗？

孔：这很荒谬。我写作的时候，并不是回应这个问题。

问：在书中，您通过对地方军事化和地方名流——绅士的剖析，就近代中国始于何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旧秩序衰落（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开始不会早于1864年，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这是中国近代的开端吗？

孔：对中国近代不早于1864年界定，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游戏”，而是“对历史动力的识别”，即是什么力量推动了传统中国进入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化为近代的动力主要来自内部社会结构的演进，它的演进是一个长期而又缓慢的过程。

问：据有关学者统计，您在这本书中仅引用的方志就多达39种，此外还有许多文集、年谱，以及湘军、淮军、团练志，清实录等，您



在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有没有语言障碍？作为中国人，我都很难看懂繁体字了，你怎么克服这个障碍的？

孔：（给我们读了英文版《叫魂》封面上一段乾隆朱批文字）哈哈，看不懂的时候，我也咨询了我的中国朋友。

问：《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吧？

孔：是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版。

问：这是1994年去法兰西学院的系列演讲吗？

孔：是的。一共四篇演讲，加一个序言。我的法国朋友Pierre-Etienne Will魏丕信教授还为此写了一个很长的序言，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怎么也不愿意接受这个序言，我也不想为别人的观点负责，所以斯坦福出版的时候只包括了我的演讲。

郭锐：与《叫魂》研究乾隆治下的专制体制相比，这本书研究的是中国政治从内部演变的动力，似乎与当下中国问题更相关。

孔：对于这本书，我想提醒的是，书名是“origins”，而不是“the origin”（英文题

目中“起源”是复数的形式——笔者注），起源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如果你来看这本书，第一部分是魏源，第二部分是冯桂芳，讲了很多因素。第一章，“魏源思想中的参与和权力”；第二章，“试验中的改良”；第三章，“毛主义的农业和旧政权”；第四章，“基本议程的转化”。这本书把中国现代政治制度面临的问题加以概括。现代中国的起源，需要从中国自己思想传统中寻找。

问：1990年8月31日至9月3日，您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西方对近代中国政治参与及政治体制的影响》的学术演讲。在演讲中，您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什么那么让当代的中国人失望？好些看来颇有希望的发展，为什么老是以压制、腐化告终？您如今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孔：其实，我很想知道在中国会有多少人觉得失望？

问：您的中文名有时也写作“孔斐力”或“孔菲力”送给北京图书馆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的扉页上所留的赠书签名为“孔复礼”三个汉字，而目前多用“孔飞力”，究竟哪一个才是您正式的中文名？

孔：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的时候（1979—笔者注），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孔复礼”，然后朋友们都笑了，笑得很尴尬。因为这个名字孔夫子的味道太重。然后我就说，怎么叫我是你们的事情，我不干预，无论你们叫我什么名字，我都会很高兴。所以我的朋友叫挑了一个“飞力”给我。不过，后来我的一个好朋友告诉我，这个名字有些像自行车牌子，不过等我知道了，为时已晚了。

问：在《叫魂》第一页中，有这么一句话：“归根结蒂，我们最大的激情，就在于将意义赋予生命——尽管这种意义有时是可

怕的 (hideous)。”“将意义赋予生命”，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您对《叫魂》以及历史研究的期待吗？

孔：我是这么说过，不过我觉得这句话的中文翻译有个小错误。我的原文是“*Our dominating passion, after all, is to give life meaning, even if sometimes a hideous one*”. Hideous 是“可怕的”意思，但被翻译成“并不是显而易见了”，这个单词并不是“hide (躲藏，隐藏)”的形容词。❶



#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周濂访谈

特约撰稿人 田波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的新书《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出版后，在北京万圣书园、上海季风书园等著名书店的销售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这本书是周濂的第一本随笔集，辑录了他十年来公开发表的随笔文章，包括时评、书评及思想笔谈等。有书评人认为他将严谨的哲学分析与复杂的社会现实对接起来，是公共写作的一种新形式。北大出身而在香港中文大学完成博士学位的周濂先后师从著名哲学家陈嘉映、石元康等，是当前最被看好的新生代学者之一，其学术专著《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由北京三联书店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著名学者赵汀阳认为该书作者“显示出了优秀的问题意识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并且相当熟练地使用了语言分析的方法。”近日，记者就《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中涉及的基本主题，以及周濂如何从一个资深文艺分子转型成一个有公共关怀的青年学者的心路历程，对他做了专访。





## “许多看似鼾声如雷的梦中人其实不过在装睡”

你的新书书名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跟鲁迅当年在《呐喊》自序中提出的“铁屋子”的比喻很相近。如果装睡的人很幸福或者假装很幸福，你为什么要去叫醒呢？这书名暗示你是一个悲观论者？

在鲁迅的笔下，铁屋里的人们安心熟睡，不仅浑然不觉即将闷死的未来，甚至还梦见幸福。今天的状况不同，铁屋虽然还在，但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醒来，与此同时，许多看似鼾声如雷的梦中人其实不过在装睡，这些人有的出于恐惧，更多是为了利益，但无论是哪一种动机，我都不认为他们能够真正遇见幸福。

我的确偶尔也会感到焦虑和无力，但整体而言，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就像我在自序里说的，我还是忍不住会想，改变在发生呢！当然，这个书名初看起来是挺悲观的——既然装睡的人永远都无法被叫醒，那是不是意味着两手一摊，毫无办法了？在这里我无意探讨让装睡的人醒来的101种方法，我想说的是，对于他们来说，醒来与否其实是一个事关“决定”和“改变”的问题。进一步的，我想说的是，关于“一个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如果存在答案，就必须要让每个人认识到这是他本人赋予他自己的，惟其如此，这个答案才会真正有

效。事实上，这个书名更多地不是在敲打别人，而是想迫使每个有理性的人都反躬自问：我是否以及为何要装睡？能不能不做坏体制的合谋者，选择做好体制的合作者？在一个不正义的社会里，我为什么要做一个正义的人，如何才能做一个正义的人？这些问题不仅提给读者，同样也是提给我自己。

读《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很有知识上的挑战感，很多人会问讲清楚这些道理，真的需要引述这么多知识吗？还是你在尝试一种不同于学院、也不同于媒体人的公共言说方式？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喜欢掉书袋子，我不否认如果引用太多会让文风滞涩。但另一方面，我愿意做几个自我辩护，首先，我不擅长写作短平快的时评文章，为了扬长避短，我往往会有意识地往后退半步，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另一种公共言说的方式，但我的确会暗暗希望自己的文章在脱离了特定的事件与背景后，仍旧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其次，也许是专业训练导致的后果，对我来说，如果能在具体入微的事件里发现抽象理论或者超级概念的痕迹，并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恰切的关联，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我特别喜欢莎士比亚戏



剧《李尔王》中的一句台词：“我将教会你们差异”，据说维特根斯坦曾经想把它作为《哲学研究》的题词。我在思考写作的时

候，常常会想起这句话。我希望自己能够慢慢学会用“会心会意”的日常语言去表述这些复杂深刻的差异。

## “我并不因为自己的公共介入和写作而感到不安”

从你这十年写下的文字轨迹，可以很清晰看见一个资深文艺分子如何成长为一个关切社会与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哪样一些关键性的因素推动了你的转变？在你的政治哲学研究与你的公共言说之间经常会有紧张或挣扎的感觉吗？或者说相对于某些青年学者总是试图写下经典的学术抱负，你在公共写作上花费这么多时间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吗？

在去香港攻读博士之前，我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虽然也在本科和硕士期间读了不少的哲学书，但基本的情感模式和表达方式都是典型的文青范儿，1999—2002年前后大约3年的光景，我一直在新浪的影视论坛和读书论坛里混。2006年的时候，新浪论坛搞了一个10周年庆典，我发现自己的一个旧ID赫然被列在骨灰级的网友名人堂中，让我唏嘘感慨了许久。

2002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去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我一直在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选题中徘徊，一个是海德格尔对于康德先验演绎的研究，一个是政治正当性

问题，之所以最终选择了后者，是因为相比之下正当性问题更紧迫，也更与我的社会关怀有牵连。某种意义上，我很庆幸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而不是逻辑学、心灵哲学或者形而上学，政治哲学要求研究者具备健全的现实感，这让我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去关注公共事务并且实践公共写作。我很明确自己的身份就是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与此同时我也并不因为自己的公共介入和写作而感到不安。一来我每个月基本上保持一篇专栏文章的工作量，并不特别占用我的时间，二来综观古今中外，无论柏拉图、霍布斯、洛克、约翰·密尔还是孔孟、朱熹、王阳明，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书斋学者，其中像洛克、密尔甚至还是标准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都写出了藏之于名山的著作，可见公共写作与学术研究没有根本的冲突。

很显然，你对于电影、话剧、小说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关注，让你与其他的纯粹学院派知识分子很不一样，这种虚构性的艺术构成的感觉世界在你的公共写作中扮演何



种角色？或者说，你如何看待这些对纯艺术的兴趣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智生命成长中的作用？

多样性和丰富性是这个世界馈赠给我们的礼物，同样的，一个人的心灵也应该是这样。爱因斯坦爱好拉小提琴，维特根斯

坦喜欢听古典音乐，看侦探电影，热衷建筑艺术并亲手设计和监造了后来的保加利亚驻奥地利大使馆，我不清楚这些对纯艺术的兴趣究竟在他们的心智生命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但至少让他们的形象特别是心灵变得更加丰富，而丰富性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内在价值。

### “真正健康的国家要在政治社会的层面上确保自由、平等、正义等基本政治价值”

你在书中对不丹的幸福模式进行了讨论，也在其他的地方对于幸福进行了诠释，在你看来，幸福是更多地与公平、公正相关，还是与自由、权利相关？

这个问题太过复杂，很难用短短几句话说明清楚。如果一定要简单扼要地说，我愿意这么表述：社会制度的正义是确保每个人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一个正义的社会不一定是幸福的社会，但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一定不会是幸福的社会。

我们都知道美国《独立宣言》中说，人人生而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我们必须问这么一个问题，让一个没有能力去追求幸福的个体拥有了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否意味着幸福的必然丧失？这是很自由主义的一个问题，我愿意这么回答它：首先自由主义是

一个强者的道德，它赋予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同时，也要求每个人承担起在追求幸福的过程所必需承担的苦痛以及也许最终无法得到幸福的责任。其次，在自由主义的政治框架里，并不排斥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共同体的建立。常有人说这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沙漠的沙子一样，跟周遭世界没有关联，孤独、无助。我认为至少在中国，造成这个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去几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它把国家和个体之间的中间层彻底地摧毁掉了。这个中间层是什么？是大大小小的共同体。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但与此同时你也是要和你朋友、你的爱人结成某种共同体，非如此你不能感觉到归属感、安全感。

我以前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政治社会、多元共同体与幸福人生》，社会和共



共同体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社会结成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契约关系，通过服从一些公共的规范和法律，确保我们可以共同生活在一起。“共同生活在一起”是一个政治社会所要保障的最基本状态，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一定还会问另外一个问题，我如何才能过上一个幸福美好的人生？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同体的生活予以保障的。在现代社会来临之前，共同体更多的是基于身份、血缘而形成的。新型的共同体也许会突破这些旧有的纽带，但不管它的形式是什么，都必然是一个非常紧密的熟人关系，在里面你可以获得想要的情感的、心理的慰藉，这些东西保障你获得幸福生活。一个真正健康的国家必须要在政治社会的层面上确保自由、平等、正义这些基本的政治价值，在这个基本的政治框架下面，那些大大小小的多元共同体确保每个人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政治社会与多元共同体相结合，才会是一个健全的社会。

1989年之前的苏联，以及文革结束之前的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共同体所承担的责任交给了政治社会，试图在政治社会的层面上实现共同体所承担的职能，所有人一起过上高度同质化的幸福人生，这么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哪怕是以至善的名义，也必然会造成各种各样的灾难。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放弃了这个目标，与此同时多元共同体的层面的东西依然没有建立起来，我想这正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会感到凄凄惶惶不可终日的原因。因为你没



周彦

有归属感，面对过于庞大的、不可约束的国家，你很难产生认同感。除此之外，你又找不到一个替代品。所以现在的局面是，要么成为原子化的个人主义者，要么成为国家主义者，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所以说，我们常常讲言论自由很重要，但是还有一个自由很重要，就是结社自由。结社自由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双重意义：伦理学的意义就是给我们提供幸福人生的一个载体，而政治学的意义则在于，个体只有通过结社自由才有可能跟庞大的、不可约束的政治权力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抗衡。

有些朋友读了你的书，觉得是一种不错



的用理论和智识来诊断现实的方式，但他们也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关键的问题不是解释或者批评这个时代，而是改变这个时代。你觉得写作能够改变时代和周围的人吗？

马克思本人恰恰是通过解释批判这个

世界来改变这个世界的典范。我总是相信改变观念就是在改变世界，而且这是发根起由的改变。当然，另一方面，观念作用于世界的方式总是隐微和曲折的，你无法预料也没法预定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具体改变这个世界。

### “网络社会是有限人的有限联合”

你在微博上比较活跃，微博生活或者说网络生活、网络文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是微博控吗？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微博无法形成有效讨论，只是一些资讯的传播。你如何看待？

2000年夏天，也是我网瘾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BBS中的政治游戏》，虽然是十二年前的旧作，其中的一些论断我认为至今仍旧有效。汪丁丁老师当年断言网络社会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但是我却始终认为若从整个网络的大背景看问题，与其说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不如说是“有限人的有限联合”，这种联合的基础要么是“趣味”要么是“利益”。网络世界看似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是一个扁平的世界，实则却是由各种壁垒分明、界限森然的小共同体“合众”而成的“整体”，由于人们深陷于各种“非理性的不一致”，在经历了若干次惊天地泣鬼神的乱战之后，会越来

越倾向于退回到大大小小的共同体内部，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貌似在追求自由的表达以及表达的自由，实则却是在寻找趣味的投契以及幻觉的相互支持。过去十二年里，无论是BBS还是微博，似乎都在印证我的这个判断。

我曾经一度希望网络世界可以突破传统的解放政治格局，实现所谓的生活政治。在解放政治的斗争策略里，人们依然在旧有体制的游戏规则内与专制力量玩压迫/反抗，控制/挣脱的对抗性游戏，而在生活政治的范畴里，网民们完全可以对旧有的游戏规则不加理睬，关起门来自己玩自己的游戏，实现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自由结社。尽管不同的网络社群彼此之间理念不同旨趣不同，但是当成千上万的网络社群汇聚在一起时，就是一个对更大的更具压迫性和欺骗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世界也许意味着一个更加多元化、去中心化的政治时代的



到来。

另一方面，从中东的民主化进程来看，显然网络世界是能够在解放政治的范畴里有所作为的。当然，正像所有人都意识到的那样，随着技术的发展，在现实世界中不能彻底实现的言论审查和监控在网络世界却可以得到事无巨细地落实，说得更直接一些，网络时代正在使得“全面控制”成为一个可预见的事实。

你对日常词汇中隐含的悖论或大众心态做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分析，比如对“不就是”、“又怎样”等背后的犬儒主义心态的分析，这种通过对常见词汇切入大众心理和思维结构的分析方式是如何形成的？与陈嘉映教授的影响有关？

或许是因为深受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影响，我相信日常语言就像是机车上的各种把手，改变它们就有可能改变车子的运动轨迹。虽然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改变政治秩序，但至少可以通过改造我们的语言秩序来改造政治秩序，以犬儒主义心态为例，我相信通过弃用“不就是”与“又怎样”的表述，一定会对我们造成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从1996年开始上陈嘉映老师的课，十多年的耳渲目染，可以说他对我的影响渗透在点点滴滴方方面面。我个人特别喜欢他《从感觉开始》中写的那个开场白：“我们的确要从感觉开始。要是对所探讨

的没有感觉，说来说去不都成了耳旁风？”

这句话提醒我们，再玄妙的思考、再抽象的概念都可以也应该与我们的日常的所感发生关联。有不少人以为哲学就应当活动在最抽象的层面，但我却以为真正的哲学思考应该游走在具体的所感与抽象的所思之间，哲学思考是一种居间的状态。

今天像你这样的年轻一代学者绝大多数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体制化的挑战，很多人也确实以学术的名义为自身的体制化辩护，体制似乎在收编一群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你似乎是一个“异端”，生活在学院中而积极地面向公共社会发言，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心理压力或来自学校的压力吗？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生活在学院之中同时又积极地面向公共领域发言，我不认为这有多么的特立独行。在中国人民大学，有不少老师都是这么做的。我一开始也和很多人一样，对人大有这样那样的误解，事实上自从我2005年11月任教以来，从未因为思想言论受到过校方或者院方的任何压力。事实上，我认为人大的整体学术氛围相比北京的一些兄弟院校要更加的自由和开放。

体制化的确是一个挑战，但是当我们用“收编”、“收买”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体制时，就已经天然地将体制和学术、体制和自由对立起来了。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也不是一个彻底的反体制的人，虽然



现在的学术评审体制、各种项目申请都在极大地扭曲学术的生态，但与此同时，我始终认为还存在着一些自由呼吸的空间，可以让你选择不成为坏体制的合谋者。

最新一期《南风窗》独家策划是关于“利益分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其中弥漫着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认为他们空洞、软弱，并且高度利益分化。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公共知识分子，你如何看待这一批评？又是如何界定自己的学术与公共关怀？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仅仅在两年之前，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头衔，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人格的力量和理性的声音，但是仅仅两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被缩写成为了公知，与此同时被缩写的还有他们的人格力量、道德操守以及知识水准。以至于在今天提起“公知”二字，就像上海话里的“瘪三”一样成了骂人的字眼。一个更加有趣的现象是，那些被冠以“公知”的人大多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而那些举着“公知”帽子四处乱扣的多为非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如果仅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扣帽子的比被扣帽子一点都不少公共性，他们的微博粉丝数量至少以万计，每天同样是在对着公共事务在发声；如果从利益分化的角度看，我不晓得谁是真正活在真空中，如果拿了苏联的钱就是在为苏联的利益背书，那怎么解释我党一贯为人民服务、为祖国谋利的历史？如果拿了福

特基金会的钱就必然是在为美国的利益说话，那怎么解释同样还是这些人，天天在领政府开出的工资？我始终认为，利益分化也许是一个分析的角度，但如果本着利益还原论的思路去解释一切现象，则未免太过粗疏而且错漏百出。

在一个利益博弈公开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利益代言人从幕后操盘手变成了台前主唱。各方都在变着法子试图让公众相信自己是为公共利益考虑。在我看来，理想的状况固然是在每一个公共问题上各方都能基于公开互惠的原则进行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但更加现实的做法也许是，在具体的公共问题上应该鼓励利益代言人为一己之私利充分地提供私人理由，而不必苦心谋划“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就此而言，现在这个时代恰恰不是利益分化的太过了，而是利益分化的还不够明白、不够彻底、不够公开，如果各种利益集团真的能够开诚布公地选取代表，就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进行理性的博弈，那么中国将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假借公共理性的面目来混淆视听，一定会有人根据政治正确性站队并打压异己，而所谓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些像先知一样急匆匆地告诉他人必须做什么的人，不是那些刻意强化网民的预设，曲意迎合并满足执政者复杂愿望的人，而是那些愿意往后退一步，让人们对日用而不知的观念陌生化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知识



分子不仅应该质疑政府的权威，质疑民众的权威，同时也要质疑自我的权威。

常有人批评知识分子面目丑陋言辞乏味，只知坐而论道不懂起而行事，所有这些批评古已有之，也常常击中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忍不住会这样想，每个人的性情、认知、职业、思想背景各个不同，只要目标方向一致，你玩滑板，我玩暴走，你边走边唱，我一言不发，都是在赶路，相煎何太急？只要我们都是想要推倒那高墙，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我运垃圾，都是在推墙，相煎何太急？ 



蓝鸟 肯特(美国)

《美洲黑白木刻》(苏林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0年6月)



獨立閱讀

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文  
景

财新传媒  
Caixin media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敬請來信告知。

獨立閱讀討論區：<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